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338 期
2021 年 10 月 31 日

目 录

【论 文】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袁 剑
整体感与中国性	
——20 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袁 剑
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心和关系	
——从《想象的共同体》看民族主义的困境和消解之道	张巧运
从“帝国之眼”到疆界之辨	章永乐
王赓武谈他的家与国	王赓武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¹ ——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袁 剑²

内容摘要：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最终从结构动力角度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群体的“统一环”，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并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链接，这种边疆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关键词：一般思想史；边疆思想史；统一环；人文-地理；关系学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梁漱溟在其已成经典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曾充满期待地指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³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和平尚未可期，以“调和”为特质的中国思想类型尚未真正成型，但在后世的实践层面，这种以兼容合一为思想旨趣的中国文化却始终是我们努力达致的目标之一。

随着 20 世纪的逐渐展开，中华民族逐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化的独立自存已然是不可撼动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思想史的关注也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一个中心议题经由历代思想秩序、意识形态以及后来基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转变。⁴在当下我们认知内部结构与内外关联变得如此迫切的时候，如何认知国家的内部空间特质及其历史变迁的思想史逻辑，就成为在国家与跨国语境下理解和阐释边疆及其时空意义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认知中国思想史整体性的重要环节。

一、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

毋庸置疑，地理特征与文化聚合为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物质与精神基础，并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维系着中华认同的连绵不绝。这种基于历史连续性与地缘关联性的“连续性时空”，成为容纳中国历史与现实族群、物质与文化观念变迁的“包容器”，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整个中华文化生命律动的现实根基。但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长期以来，受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

¹ 本文刊发于《学术月刊》2020 年第 11 期。

²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³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 1 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525 页。

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9-21 页。

与目标》一书中所揭示的文明“轴心期”影响，我们对公元前八百年左右形成的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大文明中心形成了某种本质化的认知，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雅斯贝斯本人，也注意到了轴心文明本身的有限性问题，并指出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类也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的限度问题以及彼此间的关联性，“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¹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化对于“轴心文明”的边缘认知，就成为我们理解并揭示“文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关系的关键环节。

古代中国的轴心文明特质，由于中国进入近代的被迫性以及近代转型的不充分特征，以至于在当下的思想史叙述中，始终面临着一个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与作为国家体的中国之间的空间契合难题。这一追寻空间契合的努力及其实践，经历了一个古今转换过程。大体而言，在古代语境中，在话语实践层面，可以借助某种具有道德意味与弹性空间的“天下”叙事来构筑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超/非地域的中国观，道德在其中具有某种普遍适应性，一如民国时期著名政治思想家萧公权所言：“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后者则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虽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则为一合理之标准。”²

在这之后，社会变化日甚，思想领域随之调整，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在秦汉，与完成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相适应，诸家学说逐渐合流，而儒家则凭借其建立在深厚小农生产经济上的血缘宗法纽带，吸收各家观点并加以改造；在这当中，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进行了异质同构的类比关联，从而构筑起一种宇宙论系统图式，以强调自然-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秩序。³

而到了近现代，随着 19、20 世纪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体系的全面确立，诸多关于空间与区域秩序的传统实践与逻辑受到了巨大挑战，世界各区域开始广泛出现思想空间的“民族国家化”图景，在现实实践层面，以国家为前提来构筑思想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方式，即便是之前就已成型的轴心文明区域也概莫能外。中国本身也经历了从王朝向近现代国家的转变，传统意义上对于王朝的认同也渐次转化为更具抽象性的国家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与思想叙事。这种基于“民族国家化”的思想史叙述，客观上塑造了以国家当代版图为标准空间的特质类型，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于国家思想气质与知识类型的认知，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习惯了对于中国知识地图和知识空间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叙述，以及在这种叙述中形成的对于中心与周边的均质化想象之后，由于具体叙事空间的前后差异，就会历时性叙述与共时性实践层面暴露出明显的认知等级格局。这与费孝通先生所指称的社会家族结构的差序格局有类似之处，但同样存在不同的情况。例如，当我们以历史时期的西域认知和当代基于现实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中亚五国认知，并试图加以连贯性的思考和论述的时候，关于中亚是什么的问题，就逐渐成为我们理解和认知层面的一个难题。在我们的对外认知链里面，并不存在一个认知深度渐次递减的趋势，恰恰是核心区具有知识

¹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第 14-15 页。

²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第 48 页。原书初版于 1940 年。

³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 页。

的最高密度，域外的欧美等区域同样具有较高的知识密度，而边疆-周边区域恰恰处于知识结构的“塌陷区”。这种局面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当下全球互联的时代，凸显出我们当下在认知与中国相接的周边世界过程中所存在的某种“断裂性”，尤其是古代与近现代话语之间的错位。这些话语结构方面的错位，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着我们对于整个外部框架的既有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去认知和填补思想史中的边疆“缺口”，从而在认知框架上揭示这种理解古代、近代与当代思想叙事中所存在区域间关系，进而塑造一种更具整体性与“边疆”包容感的中国思想史话语，或者说，去构筑一种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类型。

二、理解“统一环”：边疆思想史及其关系维度

边疆既是一种结构，也是一种思想。作为一个具有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中国，理解边疆区域在中国历史上的内部逻辑以及这些逻辑与整体性的王朝治理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简言之，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中基于地缘与人群基础的“统一环”结构，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在我们当下对于国家叙述的“焦虑”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对于边疆所处的结构性地位的认知难题，¹童书业先生曾经说过：“元、清以新兴民族之势，利用中国天然富源，故能保持极盛大之疆域；次则唐、汉，秉本族极盛之势，外征四夷，疆域亦广；而以分裂时代之五代疆域为最小。此实可证一国之宜统一而不宜分裂也。至汉族本疆秦、汉以后所以不能有大扩张者，乃因农业经济之限制及国人狃于《禹贡》之观念所致。”²他的这一论断指出了传统认知中关涉边疆的既有框架，这种框架将边疆放到了一个实用性的位置，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其对于整体性的国家或王朝认同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用性的古代语境，从近代起转变为一种国家叙述的困境，并在当下进一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范畴与内涵的认知。

有鉴于此，面对历史生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以及当代的地缘政治格局，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国家结构下，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赵汀阳在论及“天下”时曾指出：“通过语义上的三位一体，天下概念暗示着一种理论规划，在其中，大地、人民和政治制度之间被假定有着某种特定的不可分割的必要联系。‘天下’因此就成为一个意义饱满的厚重概念（thick concept）。一个厚重概念不仅拥有全方位的综合语义，它同时还构成一种内在于这个概念的哲学语法，这种哲学语法规定着它所包含的各种含义之间具有互为条件、互相配合的关系。”³可以说，关系维度在构筑“天下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黏合剂作用，并成为思考和理解“天下”乃至中华文明历史延展性的结构基础之一。

在后来进一步论证的中华文明的“漩涡模式”中，赵汀阳系统解释了从商周一直到清末数千年来，中国逐步扩展的关键并非来自向外扩张行为的红利，而在于外围竞争性力量不断向心转入漩涡核心这一过程当中。在他看来，象形书写文字、庞大成熟的思想系统、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以及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以中原为核心形成“中国漩涡”的四大动力根源。⁴这种论述充满着逻辑魅力和启发性，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中国漩涡”生成中的内在关系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而这四大动力根源又是如何构成内在的结构关系的？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空间中构筑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整体叙事框

¹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²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上海：开明书店1949年，第48-49页。

³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⁴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架的尝试，为了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如何经由历史的锤炼最终形成稳定的“统一环”，以此为目
标，“边疆思想史”试图构筑的是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
王朝关于边疆区域及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诸族群的治理策略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特别关注中
央政权的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问题，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
形成的内部关系逻辑与内在网络。¹ 概言之，边疆思想史所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地理与人群
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统一环”的？这种结构性的稳固“统一环”是如何阶段性地生成的？“统
一环”中的环间关系得以型塑的地缘生态基础及其历史动力是什么？

在具体的结构关系层面，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并不专注于对历史上思想流派的纵向追索，而
是着力于对跨区域关系及其内部的人际、群际与族际思想关系的横向探究，探究中国内部区域
关系的。从更为一般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跨区域的横向思想关系阐释需要一种对于区域间关系尤
其是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性感知，并揭示这些关系的整体性意义。如果我们以学界对于中华民
族、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模式为例，那么，系统的分析将围绕
其内部区域结构展开，并探究这些模式中“统一环”的结构关系，具体而言，边疆思想史将着重
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
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
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产生的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
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链接，形成一种关于区域间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这种边疆思
想史路径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
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²以实现一种涵盖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解释维度的中国思想史框架。

三、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围绕着上述的跨区域、横向化阐释，边疆思想史呈现为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

它之所以是一种关系学，在于其本身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结
构性框架，以及这些关系随着王朝兴替所呈现的历时性变迁，这种关系与变迁十分重要，因为
它们揭示了边疆区域内部所折射出的相关社会-群体特质。正如挪威著名人类学家巴斯所言：“在
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体系中，就族群的文化特征来说，联系几个族群的积极纽带取决于他们之
间的互补性。这样的互补性可能会导致相互依赖或共生。”³ 这种结构性判断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述
的议题。而在这当中，最为关键的是理解各边疆区域间的“编码”系统及其构成，也就是说，必
须结构性地理解各边疆区域之间基于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生态而构成的独特“编码”方式，这种编
码方式不同于农耕区域内部的一般组织逻辑，它是一种基于各自区域生态与人文知识分类基础
上的博物逻辑，这种博物逻辑涉及到各区域间的生态知识与日常生活形态之间的相互衔接与关
联，进而构成了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关于“天-地-人”结构的区域间关联，在这种关联的维度上，
我们将能够获得兼具宇宙论（“天”的指向）、地缘关系（“地”的指向）和族群关系（“人”的指
向）的三重关系结构，从而全面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以及边疆区域与中原地域实现社会、
思想与群体关系榫接的关键要素，在此过程中，具有解释力的边疆思想史结构得以逐步生成。
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这些博物逻辑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秦汉兴替时
期，长城地带涉及的如今北疆地区的内部组织关系如何呈现，这种关系对汉朝边疆治理的
整体逻辑造成怎样的影响？到了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以北魏长城为代表而构筑起来的北
部地域究竟在北朝政治与军事

1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2 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李丽琴译，马成俊校：《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页。

格局中扮演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角色，这些区域内部的军镇社会发展轨迹究竟如何影响了之后隋唐甚至宋代的边疆治理逻辑？在唐宋转型时期，西域内部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是什么，这一区域历史与整体的唐、宋史的关系如何加以整体性的厘清与阐释？在明清易代之际，东北地区内部的社会-群体发展逻辑又呈现出怎样的特质，这一区域在明清史叙述中如何进行具有连贯性的叙述，而不至于被明清易代本身形成的阶段性特质所割裂？在过程方面，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施治，而且还尤为关注边疆地区的内在社会-群体变迁对于中央政权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于后一朝代边疆治理逻辑打上的烙印。它既是双向的，也是复线的。

边疆思想史是人文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作为中国文化及其内在实践的一种面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构筑了我们自古以来超越种族、血缘、宗教与语言的共同体认同，并内化为一种柔性思想方式，形成贯穿历史与当下的整体知识氛围。《论语·季氏》有言：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种关涉中国边疆区域的思想史路径，人文的力度与韧性形成了它与一般思想史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文德”为核心的道德普遍主义观念，其理想的涵盖范围，超越了中国既有的农耕区域，而开始进入各边疆区域，从而呈现出一种对于整个边疆区域的整体关照，进而在具体的时段生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叙事框架与风格。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这种叙事框架与既有的中原叙事框架之间的关系应避免相对生硬的空间与时段拼贴，需要找到一种相对平滑的解释，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历时性与空间性关联得以有效确立与维系。

边疆思想史又是地理的。地理因素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事实上塑造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空间，而且在文化层面，形成了深厚的舆地学传统，孕育了“九州”、“十二州”等天下地域分类，进而型塑了我们关于内外部世界的理想模型与共同体想象，《尚书·禹贡》中曾有这样一段叙述：“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¹ 概言之，这种以地理距离加以空间类型化区分的模式，虽然无法与东亚地区真实的地形地貌全然匹配，但依然内化为一种以“中邦”为核心的对于周边区域与空间关系的想象，植根于后世的历史记述与政治实践当中。因此，系统地理解中国内部的区域地理逻辑及其历时性的变迁，将会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边疆区域行政地理组织变迁图景，同时展现出这些变迁图景之中暗含着的治理思想与实践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要理解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就必须面对一个对于非“中邦”区域所具有的“边疆性”问题。²这里所谓的“边疆性”，即某一区域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空间中所处的结构性附属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中具有的反馈性与主体性，即它既处于地理层面的边缘性位置，但本身具有影响中心及其政策的重要能力。

四、理解“编码关系”与“博物逻辑”：实践的进路及其可能

思想史的阐释离不开实践的路径，关于边疆结构的思想史阐释同样如此。在历史上，长期以来交通的困难，使中国边疆与非边疆区域之间形成了理解区域关联的某种地理困境。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今交通方式的便利性，使我们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来穿越边疆地带，在对边疆景观的认知中去发现一般阅读中忽略的边疆地域间关联性问题，从提供了一种从当代实践中理解“边疆思想史”的可能。在这过程中，文献的解读结合具体的实地探查，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基

¹ 《尚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7-91 页。

²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于边疆思想史的历时性框架与共时性关怀，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的“编码关系”是什么，又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其独特的“博物逻辑”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带着这种期许与尝试，笔者在2019年7月初曾经从北京出发，由陆路连续探访了位于长城中部地带的榆林镇北台、统万城遗址、石峁城遗址，并由南到北穿越黄河，进入阴山两岸，经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寻访当地的秦汉长城和北魏六镇遗迹，之后又一路向西，前往额济纳，探寻黑水城遗址，随后折向南方，先后探访嘉峪关和敦煌，历时两周，全程上千公里。这一“重走长城线”的过程，使笔者重新去思考作为带状的长城及其周边区域在理解整个中国过程中的意义所在。这种思考期待，在回京后的阅读中得到了某种实践上的佐证。

年轻的汤因比在1929至1930年间，曾趁着赴日本京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期间，前往中国旅行，其间登上了古老的长城，在他1931年出版的《中国纪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中这样写到：“眼前那些锥状的山峰，锯齿般隆起的陡峭山坡，还有同时向各个方向伸展的山脊，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对我们的眼睛是如此陌生。当看到层峦叠嶂在中国山水画中被如实地描绘，我们还以为它跟龙或麒麟一样，是一种由怪诞想象而催生的产物。因而，即便一名西方人目睹了眼前的现实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件事还是可以确定，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要把人的印记添加到如此奇特的‘自然’之上。我相信，连罗马的军事工程师也不会在这样的山峦上建造什么特别的工事，而是坚信此处‘自然’本身便可作为一道屏障。两千年前，那些古代中国‘天下’的承命者却并没有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用画笔在群山中勾画出这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也同样大胆地将长城一再延展至几百甚至几千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山顶的尖峰——如此驾轻就熟，迫使‘自然’为他们的人类利益服务。在外来观光客的眼里，长城有两大特征使我们这些‘蛮族’充满敬畏与钦佩之情：一是那些古代的测量者运用不可思议的技巧，将山形轮廓巧妙地加以利用。”¹他这种旁观者的视角具有惊人的启发性，提醒我们，有必要将长城作为一种与“山”“水”等量齐观的自然之物来加以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完整地认识长城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与山水同在的“自然性”所具有的历史魅力；它的功用在最初固然是防御与镇守，但在这之后的数千年时间里，虽然屡经残破，但长城已经与所在的山水融为了一体。如果说我们常见的刻字勒石是一种易于理解的“编码”的话，那么，这种作为“自然之物”的长城与其山水构成了一种更具整体意义的理解中国北部生态结构的“编码”，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内嵌到文化-地理图景中的现实之物，一种始终维系人群与族际关系的社会空间结构。

从方向性上来看，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与各个边疆区域构成了我们从东-西向来理解中国内部结构的“编码关系”，在这种“编码关系”中，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如何确立并维系，进而构成整体上的中原-边疆结构，就构成了我们进一步理解整体结构的关键所在。当然，在这里，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更具衍生性的命题就是，如果我们将大运河作为与长城类似的“自然之物”，那么，它所引导的中国两大流域关系和中原-江南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编码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揭示了中国内部另一种独特的区域间关系。当然，这个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内容。

汤因比的经历与体验为笔者提供了一定的启发，但更多地则来自于对中国人文-地理关系结构的聚焦式认知。让我们回到由长城及其周边山水地域构成的“编码关系”本身，这种关系要能够确立，本身需要有更次一级的逻辑来加以构筑。那么，长城地带与各个边疆区域的关系逻辑又是什么呢？我们以嘉峪关这一通常认为的长城西端雄关为例，考察嘉峪关的时间线，我们注意到几个节点性的事件：在明初的1372年（洪武五年），时任征虏大将军的冯胜在巡视河西时，在嘉裕山西侧修建嘉峪关；百余年之后的1494年（弘治七年），嘉峪关被关闭，西域封贡之路断绝；再过了三十余年，到了1528年（嘉靖七年）的时候，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准许满速儿入朝纳贡，

¹ [英]汤因比著，司徒译：《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3页。

并将哈密回部迁至肃州东关附近，在这之后，“西域诸夷入贡者亦竟嘉峪关，不复取道于哈密”；至 1593 年（万历二十一年），时任肃州兵备郭尔古手书“北漠尘清”四字，勒石于黑山岩壁；由明入清之后，此地曾经一度废弃，至 1736 年（乾隆元年），清廷在此添设嘉峪关营；1809 年（嘉庆十四年），时任甘肃镇总兵李廷臣视察嘉峪关，写下“天下雄关”四字，刻碑于旁；1871 年（同治十年）据中俄条约增开商埠，俄国在嘉峪关设立领事；两年后的 1873 年（同治十二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命令整饬嘉峪关关城等，并手书“天下第一雄关”匾额。

从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发现，从明代到清代，嘉峪关的地位存在明显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如果我们将明清两代的疆域版图合并起来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此外，对于这一关城的别称，也经历了从“北漠尘清”、“天下雄关”到“天下第一雄关”的转变过程，而在这里，也可以与明朝-蒙古关系、清前中期的清朝-准噶尔关系、清末的清朝平定西域叛乱的整体背景关联起来。在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博物逻辑”的群体-社会-生态关系，这种“博物逻辑”与我们在农耕区域内部基于组织与财税秩序构筑的“儒家逻辑”有所不同，它建立在各个边疆区域对于相同的群体、物体和资源的不同分类方式基础上，并构成了各自对于这些关系的独特解释方式，例如游牧群体对于“纳贡”的独特解释。正是在这种“博物逻辑”的系统实践中，我们才能较为明显地区分作为边疆地域的蒙古与西域之间的关系，以及诸如蒙古与东北区域之间的关系、西域与藏区之间的关系等等。

对这种“博物逻辑”的深度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北部边疆区域与西北边疆区域之间曾经有过基于内部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政治与军事关系。这种逻辑是跨朝代、跨区域的。因此，当我们基于一般的王朝史视野来认知这些区域的时候，往往无法整体性地揭示边疆事务或事件的历史生成语境及其影响，进而难以揭示这些区域与当时的政治核心地区的结构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边疆因素。例如，如果我们能够从边疆间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北魏六镇之间的互动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更完整地理解北魏权力结构变迁中的北疆因素。在这之后，笔者又经由当年 8 月份在位于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进行的田野之旅，进一步意识到，东北与北部边疆之间在鲜卑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内部的互动关系（六镇结构则进一步将东北与西北联系了起来），到了契丹和女真时期进一步复杂化，从蒙古时代更是形成影响至今的民族关系结构。如此一来，东北、北部和西北这些位于“胡焕庸线”西侧的森林、草原和荒漠区域以及附近的农牧交错地带，其内部关系能否作出超越一般意义上对于草原游牧力量的简单归纳，进而形成超越既有的“农牧”或“中原-草原”关系架构，而经由“边疆-边疆”关系来梳理出中国在历史发展中的边缘区域及社会生成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节律及其内在动力问题。如此一来，我们或许可以更明确地避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从整体边疆区域逻辑来思考中国的历史变迁问题，并以此来思考“胡焕庸线”以东和以南地区的区域与社会发展逻辑，真正呈现对“跨体系社会”¹的现实体认，实现对于整体中国的结构性理解。

五、 结语：寻找边疆的思想史阐释

总之，正如怀特海曾指出的，一种知识的呈现与否，在于对其“理解”、“表达”与“重要性”的有效揭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渴求与勇气，而中国古代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样也是这种“活”性知识的体现，它强调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对于事件背后的人物、行为与知识逻辑的关怀。为此，正如《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在明清鼎革的时代变局中所反思的：“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夫以一代之全力，聚诸名臣为之讨论，

¹ 汪晖：《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中的民族、区域与流动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12 年版。

而所存仅仅若此。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哉！”¹因此，在当下世界的大变局时代，构筑并完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中国边疆结构理解路径，将为中国思想史的总体思考提供一种边疆维度的新尝试，同时，也可能寻找到关于边疆及其相关议题的某种思想史阐释空间。

最终，经由对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中国边疆区域间关系过程的揭示，我们将会寻找到一种指涉“物”与“人”的关系的边疆学叙事，这种叙事将超越既有的对于区域的线性化与版块性描述，而实现对于区域间关系的人文-地理关怀，以及对新疆域与群体“统一环”的全新理解。正如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城的意象逐渐由物的形态转变为人的共同体状态那样，最终，整个国家认同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里，《禹贡》意义上的“中邦”将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并呈现出普遍性的意义，基于这种“中邦”与周边区域结构性关系的整体认知，也将刷新我们对于自身、历史与国家的认知，并达致一种整体上的平衡与理解。边疆思想史的内在意义，也由此得以呈现并延续。

【论 文】

整体感与中国性²

——20 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袁 剑³

内容摘要：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以及与之并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始终是一组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构性的重要议题。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边疆-民族论述，并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结构性变迁，进而认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与边疆-民族议题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巩固和发展边疆的过程中，对民族的整体性思考如何回应并影响对于王朝或国家整体结构的理解，就凸显为一个相当具有探讨空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 20 世纪边政研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梳理与分析，尝试性地分析其中所蕴含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思想关系结构，进而理解“人”与“物”在沟通边疆与民族这两个对象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凸显这种关系结构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及其在构筑中华民族内在关系结构与中国内部区域关系框架中所呈现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整体感；中国性；边政研究；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思想史

导语：时代之变与边疆-民族议题

宅兹中国，在疆与民。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以及与之并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始终是一组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构性的重要议题。而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边疆-民族论述，并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结构性变迁，进而认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与边疆-民族议题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巩固和发展边疆的过程中，对民族的整体性思考如何回应

¹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等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一，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第 12 页。

² 本文刊发于《西北民族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70-81 页。

³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并影响对于王朝或国家整体结构的理解，就凸显为一个相当具有探讨空间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边疆观存在一个历时性的变迁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构成了与民族观的复杂关联。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传统边疆观实际上呈现了古人对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内外关系认知的总体结构。具体而言，服事观与华夷观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国古人的边疆认知视角。要言之，服事观作为一种整体观念，肯定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其社会作用，并折射出一种由核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的政治结构，在其中呈现出从“治”到“不治”的过渡状态，并由此形成若干政治层次，而这些不同政治层次之间的界限就是“边”。¹华夷观则呈现为一种与边疆民族议题相关的复杂思想体系与分类基础，并与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历经元明清三朝的系统延续，服事观与华夷观开始逐步融合，并形成一种建立在疆域版图划分基础上的、以区域治理与族类政治为特征的边疆-民族治理结构。其中，清朝所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故而魏源有如下的概述：“《天官书》曰：‘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盖东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终而成始。旁薄郁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²在继承之前诸朝边疆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清朝经由制度性的创新与实践，开创了自身独特的藩部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实践的历史空间中实现了效能的最大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我们理解整个边疆与民族结构的地理空间与基础。

基于领土主权的近代国际关系一方面奠定了国家间的互动特征，另一方面则限定了国家的内在认同空间与基础。杜赞奇曾敏锐地指出：“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下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³进入近代，随着中国外部地缘环境的巨变，原有具有南北指向的广义农耕-游牧关系不再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迫使中国对边疆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关系认知面临转型，传统的服事观与华夷观逐渐失却既有的内外外部环境，既有的藩部治理结构日益受到来自周边与域外邻国的冲击，知识界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新挑战，认识并思考这种古今之变中的边疆民族议题，并理解这一议题与中国政治经济层面独立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系。

近代世界中的帝国秩序与地缘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控制关系，而在这种控制关系下的边缘国家与社会内部混乱的、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影响和制约的结构与秩序，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边疆-民族要素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础。对此，正如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揭示的：“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剩余价值而引起积累方式和剥削体制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也就成了一种体系性关系的明证。因加入剩余价值转移组合而结成政治同盟和（或）发生冲突这一事实，同样被视为一种体系性关系的明证。根据这一原理，如果不同的‘社会’、帝国、文明以及其他‘民族’之间定期交换剩余价值的话，这些‘社会’、帝国、文明以及其他‘民族’也就加入了同一个世界体系。这就是说，此处‘社会’A可能不会是、也不应是未与他地‘社会’B接触前的那个社会了；反之，他地社会B可能不会是、也不应是未与此地‘社会’A接触前的那个社会。”⁴结合整个东亚与中国的近代转型历程来看，这种深刻的时代之变，不仅有着复杂的地缘背景，更存在一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变化，它标志着传统东亚社会与既有朝贡秩序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基于古代经验的

¹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37-440页。

² [清]魏源：《圣武记》，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³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⁴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美]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边疆与民族关系实践面临着—个具有颠覆性的、在不同程度上被世界体系化的进程当中。

在这过程中，面对近代以来诸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知识界如何系统性地认识和思考在整个文化层面上的定位问题，尤其是边疆民族方面如何捍卫中国立场，进而避免被卷入—种被殖民化的、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世界（区域）秩序当中，就成为—个重要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界对于边疆事务认知的近代转型构成了中国边疆—民族叙述及其实践资源的三大来源之一。¹作为—种具有时代精神的研究热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从那时起，中国知识界开始真正去面对和思考—个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如何迈向未来的问题，在探寻对象上不再局限于对既有历史经验的追索与迷恋，而逐步正视当时中国边疆社会与民众的生活场景，去理解其内部与作为整体的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可以说，对中国边疆区域的整体感和始终不曾忘却的中国性，构成了当时中国学人理解和认识广阔边疆区域及边疆社会的前提与基础。而在这当中，如何理解和认识边政研究中的民族与边疆论述，揭示这些论述所呈现的内在关系，以及其中所代表的关于如何形成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叙述及其不同实践路径的争论，进而理解这一时期的边疆思想史走向及其特征，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关键所在。

—、国难与学术：边政研究的时代基调

近代的中国，灾难深重。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深深刺痛了作为“开眼看世界”先行者的魏源，使他在1842年发出这样的呼喊：“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赫然以军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道。—喜四海春，—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²渐次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更令近代边疆危机全面爆发。“及至鸦片祸起，割地赔款，遂使外人知我国家之柔弱，政府之无能，纷至沓来，皆挟其所欲而去，夺我藩属，割我良港，造成空前之耻辱，贻吾族以无穷之患难，吾人述此期之情形，诚不禁心痛神怆也。”³这种前所未有的困局，深深刺痛了当时的知识界，迫使其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曾经的边徼之地与边远之民上来，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知识界认知边疆及其生活其上的民族群体的知识空间，进而了解到国际因素所具有的内在影响。正如顾颉刚在1936年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概括的那样：“国中经此数度戟刺，遂激起—班学人跳出空疏迂远之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⁴在此背景下，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学术旨趣，以祁韵士、张穆、魏源、龚自珍等人代表，“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⁵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人边疆研究的第一波浪潮，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爱国意识与知识准备由此得以萌发。

漫长的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尤为重要。究其原因，在于它—方面继承了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东方世界的压迫与控制结构，另—方面则呈现出内在的革命性特征，新的因素正在萌发，新的秩序正在生成。“20世纪的革命力量不是—个国家内或区域内的独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环节’展现自身，具有深刻国际联系的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的运动。”⁶在这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蕴含着—种正在被解放的力量，尤其是一种超越王朝的、以国家为认同基础的群体共同体结构。与之前依旧建立在既有的王朝秩序下去思考边疆、并试图回归历史辉煌的西北史地学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边疆研究更为正视当时的世界格局，已经从整体上

¹ 袁剑：《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与实践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² [清]魏源：《圣武记》，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³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8页。

⁴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21页。

⁶ 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1页。

转向国家秩序的框架，开始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维度出来来思考和理解中国的边疆，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的边疆危机与压迫秩序问题，强调新的道路与新的未来，从而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 1905 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 20 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波高潮，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具有了时代与议题上的超越性，它开始直面 20 世纪的革命与解放议题，尤其关注作为当时世界秩序边缘的中国与中华民族地位，并通过自身的调查与研究来探寻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后续的世界之变中所可能获取的新地位与新未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不仅唤醒了中国人民，更催生了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层面对于作为国家的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并开始经由边地的实地调查与科学撰述，从而在学理和知识层面进一步夯实对中国边疆以及由此构成的中国整体的认知结构。²对此，正如林耀华所回忆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积极鼓动和策划蒙满独立，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以吴文藻为首的前辈学者随之掀起边疆政治研究（简称边政研究）以示对抗。”³为此，知识界的共同期待，促成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⁴顾颉刚进一步指出，时局的迫切促使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隅，他们“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系统化。”⁵可以说，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动，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既有路径，使相关的讨论超越了既有的地理沿革等先前西北史地学主要涉及的议题，进而关注更具区域性和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诸如东北、西北等，出版相关研讨文章，并进行相关的调查活动，“甚望以监禁方式施之研究室，以充军方式施之于旅行考察，使我胸中久蓄之问题得告解决而系统之著作亦可完成，此生便无憾矣。”⁶所有这些，尤其是将东北、西北、蒙藏、南洋等放在同一个议题和同一种关怀下加以关注，是对之前仅就边地谈边地这一传统的反拨，从而超越了既有研究中的地域观与区位观，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边疆思想与边疆实践整体性及其与中国议题密不可分关系的重要基础。

对于边政研究的整体梳理，有诸多学者有过相关的著述，对具体的内容、研究方法、阶段特征等都做过详细专门的分析与梳理。⁷这里要强调的是边政研究相关实践的路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学者之间具体旨趣的差异，体现在边政研究的相关思路上，就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与历史轨迹。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禹贡》半月刊，其内容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从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变的态势，这种变化，除了受这批学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的影响外，与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当时知识界对西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理解存在紧密的关联。⁸此外，有研究者还分析了这一时期边政研究的复杂面相及其背后的议题与思路之别，并认为这一阶

¹ 列宁：《亚洲的觉醒》（1913 年 5 月 7 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 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160 页。

² 袁剑：《时局与话语：对近代以来国内关于“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³ 林耀华：《〈凉山彝家〉和少数民族考察》，《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63 页。

⁴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⁵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67 页。

⁶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92 页。

⁷ 代表性的成果如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段金生：《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汪洪亮：《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20 世纪 30-40 年代边政学的兴起》，《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等等。

⁸ 孙喆：《以沿革地理学重构边疆：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求是学刊》2013 年第 3 期。

段至少存在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学术理论与阐述路径，其一是顾颉刚的“边疆学”；其二是杨堃的“边疆教育学”；其三是杨成志的“边疆学”；其四则是吴文藻的“边政学”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其五是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¹这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边政研究内部关于“边疆”、“边政”、“边疆教育”与“边疆社会”等基础性概念与论证上存在的多重解释及其争论，在当时边政研究如火如荼的情境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学科解释与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思考方向，而其中始终关注的，但往往被我们在学术史中所忽视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边疆”这一之前未能专门关注的学科新对象，围绕边疆的社会学研究与基于社会与问题的边疆研究都在此生发。总体而言，回望中国历史上的治边实践与经验教训，并结合社区研究与边区研究的现实状况，来认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这是当时边政研究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在这当中，边政认知层面的两种期许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对历代王朝的既有治边实践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当时中国的边疆社会与群体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既有治边政策与现实边疆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早在1934年，陈炳光在其《清代边政通考》序文中就曾这样写到：“我国蒙藏回疆，地方辽阔，民族、语文、习惯，各有不同，政治、宗教，亦各具有特殊历史；益以今日边疆环境之严重，民族思想之庞杂，当国者欲以此为对象，而谋庶政之设施，并创建其一切制度，以为相循相维之根据，良非易事。……考历代治边政治之比较完备者，莫过于前清，且去今未远，情势相侔；而前清一代之典章又莫不备于会典。其书记载典制文物，同于律令，前清各种则例之产生，悉根据于此，实亦可谓为清代之根本大法，理藩则例即其一种。民国十八年八月曾经司法院交最高法院解释，认为特别法之一，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酌予援用云。凡初读此种则例者，若非探讨其渊源之会典，往往莫明其意义，是亦不仅为研究者之资料，抑亦治事者所必需也！”²这段话正说明了作为历史资源的清代边政遗产，得以在具有延续性的中国时空中继续沿用并发挥作用。这是边政研究中最具政策实用性与历史延续性的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

其二，边政研究更多地具有某种“刺激-回应”的色彩，并呈现出边疆-民族间的“人-地”关联。³这一方面在于边疆史本身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边疆投射，因此，要了解20世纪边政研究的时代特质及其内部的实践路径，就无法脱离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把握；而在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这种内在的回应动力，中国边疆的保全与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其中必须考虑的两大因素，对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坚守与捍卫确保了全民族抗战的地理与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的团结则构筑了当时和之后国家群体认同与共同对外认知的基础。这种基于“人-地”关系的时代经历，使当时的边政研究者始终不忘群体与土地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进而思考中华民族与生活其上的中国大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以此型塑了超越传统西北史地学的、具有更为强烈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指向的边政研究传统，深深地嵌入到近代以来中国议题的现实状况与学术思考当中。

二、群体团结与共同抵抗：边政叙事的两大传统

作为一种由时局所催生的研究热潮，20世纪的边政研究自然无法脱离其时代因素。如何来思考和认识基于近代变局中的中国及其边疆安全、民族发展问题，成为当时学者关注的重要命题。基于国家危亡与民族存亡的大背景，团结与抵抗，成为20世纪边政研究叙事中的两大传统。

¹ 汪洪亮：《“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² 陈炳光：《清代边政通考》，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初版于1934年），第1页。

³ 袁剑：《“中华民族”的地缘之维：共同体意识构筑中的“人-地关系”与思想史路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细言之，团结，在于超越单一族类的群体的团结，这是对当时外部时局与内部变迁历程的回应，而抵抗，作为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的基本态势，结合中国特殊的实践语境，在国家危亡与振兴的过程中成为全体民众的共同使命。这一时期的边政研究，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学术层面上的折射与反映。

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是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事件，但这两大事件的意义更多地限于国体与政体之变，就整个世界格局以及中国边疆-民族所处之环境而言，却并没有带来趋势上的好转，旧的边疆危机依旧存在，新的边疆危机接踵而来：1911 年外蒙古在沙俄主导下策划“独立”，1914 年唐努乌梁海地区被沙俄霸占，1913-1914 年英国主导西拉姆会议，企图诱使中国签订所谓的《西拉姆条约》，并染指西藏事务。面对这种政权兴替之后依然困境重重的局面，1910 年《地学杂志》创刊号中的一段文字，代表了那个变革时代爱国学者对于国家边疆安全的省思：“人生缘大地以为食息，聚国族以谋生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而每每负舆。实与民族为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之自取。……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国，而犹不可得。”¹这一论述，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所谓的中立与理性，其中充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感与强国期许，如今，我们读来丝毫没有感到历史的阻隔，恰恰说明时代精神的某种契合。在文字表述方面，将土地与民族加以一体化叙述，并强调了国土沦丧与民族危亡之间的共时性连带关系，从而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全国土，我们就必须实现民族的团结。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民族结构话语的环境下，地理学层面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已经隐约触及到疆域版图与民族结构之间同构性的现实基础与历史事实。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层层进逼，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到 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一步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并最终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全面认识中国边疆-民族议题，并进一步推进理解边疆之于中国、民族之于中国重要意义的时代命运所在。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来求得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内部各区域的团结以及中国内部各个群体的团结，就成为当时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

这种认知，同样呈现在边政研究的话语当中。1937 年 1 月，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²我们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这一论述，并认识这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集体认同所必然具有的时代特质。他并经由《禹贡》杂志，论证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土”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一方面，我们通过对外部帝国主义的共同抵抗来捍卫国土，进而团结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而另一方面，则经由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以更好地在抗战洪流中发挥“团结之力”，真正实现领土版图的光复与巩固、国家的独立与解放。

以此为契机，当时学术界开始强调由“五族共和”所转变的新的国内民族团结方式。³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边疆-民族结构的理解，也经由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从单纯强调族际关系转为兼重地缘与群体关系，并以此认识整个中国内部的人-地关系变迁。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中，“边疆”与“民族”都还没有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政治与学术界线的分类，尚处于一种语义的微妙转换过程之中，近现代用法与古代传统用法往往混杂使用，就如柯象峯在当时的论述中所指出的：“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与邻国接壤

¹ 《中国地学会启》，《地学杂志》（创刊号）1910 年第 1 卷第 1 期。

²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民众周报》（北平），1937 年第 2 卷第 3 期。

³ 袁剑：《时局与话语：对近代以来国内关系“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之区为限也。……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之民众外，边省内地，未竟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加以研究。如欲为便利研究计，加以划分，以求分工合作之效，则可用两种标准作分类之根据：（一）地域的分区法，以地理上的地位为分区研究之标准，（二）民族的分类法，以民族的单位为分区研究之标准，以及（三）掺用以上二者之分类研究法，即兼顾地理的与民族的二因素，对于作比较的研究时，尤为便利。”而在作者后续的例举中，存在今名与旧名混用的现象。¹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学者之间在议题讨论与争鸣的过程中出现某些基本语义层面的异同，因此，在诸多貌似对同一议题或者概念的论述中，不同作者实际上所呈现出的意义指向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团结作为一种充满有机感的实践方式，经由外敌入侵的外部环境与共同认同的内在动力，而成为铸牢整个中华民族结构及其内在的边疆-民族关系的关键要素。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中，顾颉刚继而指出：“我们不仅要在名义上团结，更不可在私利及压力下强迫团结，而要在同情和合作中作真诚的团结；我们要生活在相互和平之中，以求共同的存在，同样在天壤间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²他并从物质、精神和行政三个方面论述了增进团结的相关举措，那就是经济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以及边地人才的培养。经由这些方式，中国既有的边疆地域与民族群体得以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经由抗战的熔炉而进一步凝聚起来。

在日寇步步进逼、国土大片沦陷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安全，实际上成为当时的一体两面。在群体团结之外，共同的抵抗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如果从地域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日军进攻日益深入，中国的边疆地区日渐成为坚持抗战的大后方与重要基地。“抗战发动以前，我们对于边疆的认识，比较广大，好像广西、贵州、西康、青海等省，都是我们的边疆，因为这许多省份，过去和中央的交通关系，并不频繁，所以把它们当作如此观，可是现在因为战局的变迁，中央政府移到了四川的重庆，和以上各省比较接近，而以上各省，都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³当一大批中国学者投身边政研究的时候，他们所认识和探究的边疆区域，正在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战伟业的动力基地。

在著名的、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中，顾颉刚在文末写道：“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⁴抛开围绕这一议题引发的学术争论不谈，这种用笔墨熔铸成的团结与抵抗之力，构成了边政叙事的两大传统，也成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边疆-民族论述得以生发并成为共识的思想基础。

三、人与物：理解边政研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基本要素

概括而言，20世纪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由于缺乏整体性的国家观，学者所关注的往往是单一区域的事务，缺乏对于整体边疆及其各区域间关系的分析，比较侧重于对边疆治-乱逻辑、过程及其与王朝关系的梳理。进入20世纪，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新知识概念的引入，知识界开始将边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认知与考察对象，并意识到其在理解和认识国家形成与认同构筑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边疆之重要，近年国人已颇多感到……注意边疆，已为共同意识，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于

¹ 柯象峯：《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²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民众周报》（北平），1937年第2卷第3期。

³ 王沿津：《泛论边疆交通》，《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

⁴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获必远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¹这种以20世纪30至40年代边政研究为代表的“第二回运动”，经由对之前被“第一回运动”所忽视的边疆社会、边疆人物的细节性观察与揭示，开启了对于中国整体社会与边疆区域关系的理解，并以此激发了对于作为边疆社会参与者的“人”与沟通边疆各民族生活的“物”的分析与研究。

吴文藻先生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认为在民国之前，只有涉及谋划边政的策论，这属于传统科举的内容，而缺乏专门研究边政的、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专科性学问。在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国内才有少数几所大学建立了边政学系，专门应对相关问题，但依然缺乏相关的边政学学科。他并列举了边政学的两大重要意义，“第一，在本国的意义：中国这次抗战，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理想。而如何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第二，在国际上的意义：中国是反侵略的先锋，是抵抗强权的领导，亦是被压迫民族伸张正气打倒暴力的表率。……如何能使世界各国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如何能使吾国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相互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共同理想，以跻世界于大同，这便是边政学在比较研究时最大的贡献。”²为此，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他强调思想、事实、制度、行政等四个部分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有思想有结构，以思想支持结构，以结构实现思想，即谓之制度。人类本思想而决定政策，本政策而建立制度，必须制度建立以后，才能使思想见诸事实。”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付诸行政，方能确立起推进相关政策的技术与方法。而在这过程中，相关边疆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行政部门的政策实施，成为成功实施边疆治理政策的关键所在。他尤其讲到：“对外所谓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内即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与协调，亦即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的统一。”⁴在这一论述中，吴文藻实际上明确了具体的人在实施相关制度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并揭示了国家与地方行政之间协调统一的重要性，因为人需要在具有整体性的行政结构之间活动并发挥主观能动性。

进一步而言，如何来分析“人”在边疆内部的结构位置，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今日我人之边疆的边疆问题，是在‘齐民’‘同土’的观念下，求其治理；我人于边疆地带或边疆区域之人文的地文的种切，自不能不承认其各有其时代的迟滞，各有其地理的阻塞；……我人于我人先民所写下关于‘边’的‘人物志’和‘地方志’，在‘时代进化’的认识辩证下，是另有新的见解。针对现实，辨识时代，我人今日之边疆的边疆问题，是在以‘人’的问题来处理‘地’的问题，换言之，必得就‘边民’问题来探讨‘边地’问题，才可以谋求合理而适当的处理。”⁵当时学者所进行的相关讨论，是这一问题具有了普遍性意义。如田耕所言，“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来说，一方面，无论从社会构成还是从政治构成来说，边疆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世界，并不是保留内地已经被现代化消除的本来面貌的‘初民社会’，而在于其将内在各部分关联起来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的整体观不构筑在任何文明论的基础上，这个整体不是幽闭的，而要面对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着眼于西南的政治眼光、口号和学术运动也构成了这个地域最重要的现在时刻。学者需要打破政治史的中心-边陲观念，重新构造各种比较类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将边疆带回。”⁶在吴文藻和费孝通的理解之外，我们也需要在其他边政学者的知识视野中寻找边疆所具有的关联性位置。

边疆社会，在当时边政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李景汉曾这样区分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地域社会类型：“大致说，目前的中国社会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即游击区

¹ 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²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³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⁴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⁵ 胡耐安：《边疆问题与边疆社会问题》，《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期。

⁶ 田耕：《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学海》2019年第2期。

(包括沦陷区)、前方(即战区)、后方与边疆。在各区域内的调查研究,应各有其不同的注重点。……边地的社会情形,尤为复杂,向为国人所忽略,故宜为今后特别注意的调查区域。这样来完成对于全国社会情形整个的认识。”¹张少微则对边疆社会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认为“在社会形态上至少可以分为四大类别,即蒙民社会、回民社会、藏民社会与苗民社会。由于种族、宗教、语言、经济组织、婚姻制度、历史传说、风俗习惯等的不同,这四种形态的社会,无论在内部结构上,或在外形式上,可以说是不尽一样。”²对边疆社会的分析与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型塑了一种当时的跨民族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成了从边疆社会到具有整体性的中国社会的认知路径。³

在这当中,“边疆人”与“边疆之物”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例如,以边吏为例的“边疆人”的角色及其作用,常常不是我们的边疆-民族关系框架所关注的要点,往往只是作为一个简单的行动者或者事件要素存在,而在实际上,他们实实在在影响着边疆社会的运行,并以特定的大事件塑造着某一时期的边疆-民族结构框架。“国人之论边疆问题者,辄归咎于往昔边政腐败,然边政之腐败,实由于边官之庸碌。边政之良窳,与边官之贤否互为影响,其理至明。然我国边疆何以多庸碌之官,边官是否均为庸碌,则当有一公允之论评。……”⁴如何来揭示这些“边疆人”所具有的连接边疆社会与作为整体的全国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就成为一个值得努力揭示的方向。同样,诸如边茶等“边疆之物”,则当时的语境中也在生成新的意义,构成了我们理解茶马互市、茶马古道以及西南民族走廊等与整体国家治理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维度。为此,如当时论者所言:“中土饮茶风尚,既流传于塞外之后,成为边地各民族日常所必需,除在茶马易市之外,又有系于边政之重心,故政府严行统制管理,而为驭番固边之策,……今者边茶边销政策,自应废除旧时之控驭羁縻之观念,而以边民生活福利为前提。”⁵

四、结语:基于“人-地”关系的边疆-民族结构与中国整体观的确立

近代中国接续自古代中国,却面临新的外部环境,由此生发出新的议题。经数千年历史形成、并在清代前中期基本奠定的中国疆域版图,以及历代王朝实践所生成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在19世纪中期之后被迫面对一个被西方殖民秩序所型塑和改变的外部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现代性相关的边疆与民族议题,随后在民国时期,形成两者间的互构,后续所谓的“边疆民族”议题正式形成。⁶而如何理解中国古代与近代在边疆-民族结构上的延续性,以及这种历史延续背后所呈现出的差异与变化,就成为摆在当时知识界面前不得不回答的重要议题。

当然,这种情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具基础性的地域与文化认知的问题。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境,曾有过这样的概括性评论:“中国秦汉大一统,基址稳固,这是一个文化凝成的民族国家,精神贯彻到全国的大疆境。此后虽有五胡乱华、印度佛教传入,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方案、大图样、大间架,依然保存。只加一番提撕、调整和充实,即有隋唐文化之再生。外面力量转不过这一个大体系之内在精神,终于为此大体系所吸收而融化。在此大图案中,小小破坏,小小修订,小小润饰,还是这一个大图案。此后经历安史之乱,辽、金、元内侵,宋明文化,一样能撑持,能再获新生。实在还是这一个大图案,还是这一个间架,不过是继续提撕,继续调整,继续充实。”⁷抛开细节方面的差异,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强调了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主轴

¹ 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² 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

³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笔者将另有专文加以论述。

⁴ 徐益棠:《边官、边民与边政》,《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

⁵ 蒋:《边茶与边政》,《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⁶ 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⁷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82页。

与延续，以及这一文化不断调整充实的过程。历史不断延续，到了清代，中国疆域版图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理解近代边政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同样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是开化最早的古国，在五千余年间，已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应与整个欧洲来比，才能明了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意义。中国以民族协和而统一，欧洲以民族冲突而分裂。”¹为此，我们还必须由此意识到在中华文化绵延发展中，中国广阔边疆地区所存在的“地域-群体”关系，²揭示其中的地域间关联及其背后的群体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边疆逐步汇聚成中国的历史过程。20世纪的边政研究及其学者的努力，就是实践这一过程的鲜明例证，而正是依靠着他们的坚守与付出，边政研究虽然在抗战胜利之后逐渐式微，但在之前所作的研究与呼吁，第一次使公众认识和理解了国家、边疆与民族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多层关系，并形成了没有中国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就没有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的共识。正如《边政公论》发刊词所言明的：“因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较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局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³这种意识的出现、发展并成为主流的过程，是对王朝时代边裔研究中“因人定策”、“人亡政息”以及边疆治理实践的临时性特质的超越。新的域外知识与概念，如“民族主义”、“自治”、“管理”等的引入，使得近代之前原先一整套关于边疆与民族关系的叙述面临新的调整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为立场，型构新的边疆-民族叙事框架。在边政研究中大量推开的尝试，超越了既有的夷夏观念，开始更全面地思考基于边疆-民族结构的人-地关系问题，并经由对边疆-民族结构关系历史连续性与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揭示，从而实现对于整体中国及其内部关系结构的认知。只有在边疆-民族中找到中国与“中国性”，如此我们方才能够寻找到世界中的位置。

时代总在呼唤着实践。经由对20世纪边政研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得以理解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思想关系结构，并进而理解“人”与“物”在沟通边疆与民族这两个对象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理解这种关系结构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及其在构筑中华民族内在关系结构与中国内部关系框架中所呈现的重要价值。最终，我们会“改变昔日怕出门的习惯，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覬覦。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国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永不忘记在邻邦暴力压迫或欺骗分化下所被夺的是自己的家业。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⁴这种期许，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超越了一批批爱国学者的学术分歧，成为体现他们家国情怀的共同心声。这一时代之声，虽传之久远，但历久弥新，尤其是在21世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正为我们呈现一种新的启示与精神激荡。

¹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5-6期。

² 袁剑：《边疆研究要回答时代之问》，《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³ 边政公论社：《发刊词》，《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⁴ 顾颉刚：《纪念辞》，《禹贡》第7卷第1、2、3合期。

【论 文】

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心和关系¹

——从《想象的共同体》看民族主义的困境和消解之道

张巧运²

摘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人造物，是一个被想象成享有主权且边界有限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兴起给当代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通过对《想象的共同体》的研读和分析本文针对民族主义的边界与排他性的特征，尝试性从王权政治的中心与包容性来探索消解民族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王权；想象的共同体

2015年12月12日，民族主义研究经典《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安德森，2011）之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荣休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位自称“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缘，且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的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在印尼东部城市玛琅病逝，享年79岁。

作为一名爱尔兰裔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他和他的弟弟、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两人年幼时均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影响。1941年，为躲避中日战争，安德森一家离开了战火中的中国，计划从美国返回爱尔兰，却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一家人被困在了美国数年。战后回到爱尔兰不久，安德森又辗转求学英美。可以说从幼年开始，安德森就切身体会到流亡所带来的身份的“疏离”（estrangements），即个人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的差异所带来的脆弱和迷茫。

青年安德森在1953年进入了英国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1956年某天的剑桥街头，当他出手阻止英国上流社会的学生殴打一个抨击英法政府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却和那个印度“被殖民者”一起被英帝国的代表——英国学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挨打后的安德森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帝国主义的残暴，以及殖民地民族民主思想的珍贵。1957年，印尼内战爆发，刚刚经历“帝国主义”政治启蒙的安德森奔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师从印尼研究专家乔治·卡欣（George Kahin）研究印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1967年博士毕业以后，因被印尼政府限制入境，安德森先后在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研究。

1978-1979年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争则让安德森意识到民族主义已经拥有超越“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因而更加地强化了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1983年集结安德森多年研究经验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出版，这部融合了比较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论著迅速成为研究当代民族主义的扛鼎之作。出于对当时东南亚各国因民族主义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之同情，安德森的一生都在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抗争运动摇旗呐喊，并将民族主义的兴起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研究旨趣。遗憾的是在2015年岁末，安德森在印尼突然病逝，提早地结束了他跟这个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以及当代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之深深情缘。

¹ 本文刊载于《民族学刊》2016年第1期，第54-60页。

² 作者为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总是绕不过身份（identity）这个问题，在诸多的身份问题中，内涵最为复杂，对人类政治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民族身份，以及随之兴起的民族主义。近代以来，民族主义逐渐从一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被坐实成为一个不可辩驳的社会事实，当然这一过程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战乱和冲突。由此，如何理解民族主义强大的聚合力和排他性、消解民族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成为人类学研究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作为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释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宿命和丰富面貌。

在书中，安德森绕开对民族主义“客观特征”的无果追寻，一改学界对民族主义工具性的片面理解，极富创见地讨论了民族主义背后的情感和文化因素，指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的集体认同所具备的历史必然性和强大的政治动员性。安德森的学术研究既跨学科又跨地域，他对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之卓越判断、对其文化意义和政治影响之深刻分析、以及其所蕴含的强烈情感之间理性批判，刷新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安德森突然离世让人不甚唏嘘，因为就在他逝世的2015年，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冲突战争却是越演越烈。或许我们表达向安德森表达敬意和悼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继续讨论消解民族主义这个现代性病症的路径。笔者认为，前民族-国家社会的组织认同机制和中国西南各民族交互共生的历史实践，是可以给民族主义研究极大的启示。

一、边界与排他性：民族主义的想象和认同机制

在《想象的共同体》开头，安德森就明确地指出，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民族的归属（nationality）、和民族主义都是“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安德森，2011：4）。区别于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民族主义工具性的阐释（盖尔纳，2002），安德森更强调其中的情感和文化因素。根据安德森的定义，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6）。民族主义之于安德森，是特定的文化体系和政治想象滋生的果实，而民族的第一属性是边界有限，第二属性为民族的主权是平均分配的，最后一个属性为它的情感基础是“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安德森，2011：7）。跟宗教共同体和王权共同体组织社会的逻辑类似，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对人类终极命运——死亡——的一种应对方式。经过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洗礼，宗教信仰式微的时代所亟需的就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安德森，2011：10）。安德森强调，民族是实现这种转化最有力量的东西。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首先梳理了民族主义的三大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政治体系和时间观。然而“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运作和意义生产的方式，促使了民族意识的兴起（安德森，2011：45）。接着，安德森具体阐述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四次浪潮，包括18世纪南北美洲的民族主义、19世纪欧洲的群众民族主义、19世纪到20世纪兴起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及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增订版收录的“历史的天使”一章则简要地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越南、柬埔寨和中国的革命和民族主义，“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重在解释民族主义确立和传播的几个具体策略和方法，“记忆与遗忘”一章梳理了民族史选择性的建构过程和影响。

理解民族主义的兴起必须探讨与之结合的文化体系的变迁，而安德森对前民族-国家社会的三大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对时间的理解——所进行的分析则为我们勾勒出了共同体在文化表现上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特征。宗教共同体建立在共通的经典、仪式和朝圣之上，宗教语言具有单一性、神圣性和特权性。因此，“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利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安德森，2011：

12)。安德森还特别强调了具有双语能力、掌握神圣语言的文人阶级的作用，“文人在一个以神为顶点的宇宙秩序中，构成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阶层。关于‘社会团体’的一些根本概念……是向心而阶层式的”（安德森，2011：14）。需要看到的是，对欧洲以外世界所进行的探险以及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式微，是导致中世纪后期宗教共同体整合性、神圣性衰退的两个直接因素。前者不仅扩充了人们对不同生活形式的认知，更关键地是种下了信仰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faiths）的种子。这时，信仰开始有国别之分，而不再是个普世的概念。以拉丁语的衰亡为标志的神圣语言之式微，则从另一方面标志着“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和领土化的过程”（安德森，2011：18）。接着，安德森总结了王朝共同体的三个特点：第一，王权有一个至高中心、合法性源于神授。王朝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放射状辐射开来，边界非常模糊；第二，王朝的臣民“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安德森，2011：18）；最后，在战争之外，王朝也经常通过异族通婚结盟的形式进行扩张。因此，王室基本上都是混合血缘，而不属于任何单一民族。最后，安德森关于时间观变迁的论述尤为精彩。通过对中世纪教堂里的浮雕和彩绘玻璃里人物服装的观察，安德森指出，前人的时间观是垂直、平行的，导致的结果是前人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是垂直并行而非横向连接的。而现代人认为时间是延续流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由此形成历史感。而历史感对民族主义情感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就没有所谓的根基，也失去了将偶然转化为意义，短暂转化为永恒的条件。以18世纪的小说与报纸为例，小说把本来散布在各地、互不相干的人归纳进了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民族”（安德森，2011：24）。当不相干的人在同一时段阅读同一张报纸的行为，成为一种新的“晨祷”形式，这也就制造出了共同体的想象。安德森指出，随着以上三种文化根源逐渐衰落和消减，“人们会开始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实践有意义地联结起来的新方法”（安德森，2011：33）。由此，民族主义应运而生。

在“民族意识的起源”一章，安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急速地破坏了宗教共同体、王朝和神圣时间观的文化根基，加速了民族意识的兴起。以英国和法国为例，安德森发现，世俗语言的选择是逐渐的、不自觉的和实用主义的。在印刷资本主义扩张中形成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其一，通过机器印刷、市场扩散的口语方言成为新的交流和传播的工具；其二，印刷资本主义固定了这种语言的文法和规则，在长时间后，民族的印刷语言也逐渐形成其古老、恒定的形象；最后，印刷语言成为新的、世俗的权力语言，广泛地被民众所掌握使用。由此，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模式性和可复制性，一旦被唤起，很快便能在各个地方蔓延。接着，安德森阐述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激起的四次冲击波，即构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四种不同的实践。

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于南北美洲的民族主义被安德森称为“先驱者”（安德森，2011：48），这些新兴民族-国家是旧世界和亚非民族-国家的模型。成就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主要是海外欧裔移民的后代，因回母国的朝圣之旅被“束缚”，转而在移民地组建以民族为基础的新共同体。安德森所谓的“被束缚的朝圣之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移民后代不管出生在新世界的什么地方，不管教育程度有多高，他们在官僚系统中流动的终点都是移民地本身，而非其先辈的母国；其二在追求仕途的道路上，这些移民后代结识了很多跟自己遭遇相同的伙伴，这些想回“母国”效力而不得的知识分子，旋即成为新兴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基础。南北美洲民族主义兴起的其他原因还包括：母国对殖民地的压榨，启蒙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卢梭以来对文化性格与地域关系的思考，印刷资本主义对地方性形成的驱动，以及这些新兴国家本身的政治封闭性和经济的自我满足性。19世纪欧洲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被安德森称作是对之前南北美洲民族主义的“盗版”（piracy）（安德森，2011：66），形塑了新的独立民族-国家。实际上，对大多数欧洲官员来说，并不存在“被束缚的朝圣之旅”的隐忧，因此促使这场运动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印刷语言，即语言民族主

义的兴起。安德森再一次强调，同一、固定、世俗的语言将一个族群勾连成一个整体，成为共同体想象的根基。其次，学校和大学的作用不容小觑。恰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安德森，2011：69）。最后，新兴的阅读阶级（reading classes），即识字的资产阶级、贵族、地主士绅、专业人士和商人，成为这场语言革命的主要消费者。这些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手持一张用其看得懂的文字写成的邀请卡，慷慨地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总而言之，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母国与殖民地、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的一次断裂。

当然，官方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的一个特例。统治阶级一方面想顺应民族主义的潮流来收拢人心，另一方面又要保卫王朝制度。以比较成功的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为例，二者分别选择了地方性语言作为王朝中心性的一种象征，极力将臣民划归在同一个民族范畴之中，同时，也在加速进行帝国主义的自我扩张和顽固捍卫王朝内部的不平等性。二战后东南亚和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结合了欧洲语言民族主义和官方民族主义的取向，其特点还在于，获利于殖民政府教育制度的双语精英对民族的建构。这些地方的知识精英同样经历了“被束缚的朝圣之旅”，绝大多数人仕途的终点是殖民地统治中心，只有很个别的人可以去母国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最终也只能回到出生地任职。另外，印刷资本主义之外，收音机与电视成为了一种新的召唤共同体想象的媒介，特别是对于不识字的人群来说。在第八章中，通过辨析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和以阶级意识形态和阶级压迫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安德森再一次深刻地指出，民族主义的根基在于人性根本的对团体的强烈情感需求。

“历史的天使”一章还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民族主义的特点，第十章关于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的论述则分析了不同的定义民族边界、整体和历史性之方式，虽然这些定义常常是混乱的、随机的和偶然的，但却无一例外地固定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最后一章中，安德森指出，记忆和遗忘是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必要的手段。为了强调新空间与旧空间的平行对应，以及新时间与旧时间世俗的联系，民族—国家的独立历史必须被选择性地建构，而其中被牺牲的则是民族之间的兄弟之情，手足相残的故事也一次次地悲剧上演。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独辟蹊径且深入浅出地指出民族主义建构和兴起的三个重要特征：第一，民族是想象的、历史的产物，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臆想，基于人类对归属感和永恒性的情感诉求，民族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如生活世俗化、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瓦解、“国际主义”式微等历史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政权组织体系；第二，人们往往把民族想象成一个边界明确、领土化的概念。尽管民族身份和民族—国家边界的划分充满了随机性和人为性，但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封闭、排外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随意地改换自己的民族属性；最后，民族主义的建构和扩张离不开精英知识阶层的推波助澜，研究民族主义不能忽视民族主义知识的生产。

二、中心与包容性：王权传统对民族主义的启发

受《想象的共同体》的影响，当代学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逐渐聚焦在族群边界的想象和制造之上。而当族群边界被坐实之后，民族主义就变得越加封闭，民族逐渐从“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一种固化的实在，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发不可调和，进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也看似无法避免。然而，民族主义是否仅仅靠区分族群边界来构建？民族主义封闭边界带来的危机如何消解？是否可以丢掉民族这个束缚，寻找各族群共生共存的方式？这是《想象的共同体》没能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是走出民族主义泥潭的有益尝试。既然民族也被定义成一种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就必然要回到人类如何建构整体、划分外部边界、分配内部权力这些根本

问题上。当我们在这些问题层面，对比民族主义和另一种共同体——王权——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或许可以找到超越民族-国家模式来整合社会的其他可能性。

在安德森的论述中，民族主义是宗教、王权共同体消亡之后的产物，民族-国家和王权共同体的差也异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权利均享、边界有限的概念，而神圣王权却强调中心集权、边界模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类似于中心集权的王权政体，民族-国家也常常通过确立“典范中心”和“辉度”来塑造整体性和向心力。实际上，在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机制中，既有对边界偏执地追求，同时也有对中心典范和国家辉度热烈地追捧。“典范中心”和“辉度”这两个概念均来自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格尔兹，1999）。格尔茨指出，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王室的生活就是神圣理想生活——典范中心——的范例，以国王为中心的极其奢华隆重和充满辉度的仪式庆典，则是对此宇宙秩序下“典范中心”的不断确认和再现，以起到教化群众、确立规范、凝聚振奋人心的作用。王权的世界里总有一个“典范中心”和“辉度源泉”，从王室到平民都必须遵循典范中心所确立的秩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不仅剧场国家需要神圣国王，前民族-国家社会也需要充满辉度的光辉帝王，民族-国家里也不乏伟人英雄。彼得·伯克（Peter Burke）《制造路易十四》一书发人深省地阐述了帝王伟人对塑造社会整体性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伯克，2007）。通过展现“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光辉”形象是如何被各种官方宣传媒介——绘画、文学、石雕、纪念章——等等所制造的，彼得·伯克尖锐地指出，这种官方制造的帝王形象往往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对光辉君王形象的诉求。帝王的光辉被等同于法兰西帝国的荣光。对比路易十四的形象工程，彼得·伯克在书中进一步地指出，20世纪对希特勒、斯大林以及美国总统们的形象宣传，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对伟人领袖的崇拜，就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归顺和膜拜。正如白晗、汤芸指出的那样：“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说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话，这里的想象和建构其实有两条路径：一为基于民族边界的想象建构；一为基于典范中心的想象建构。前者让我们知道了何为‘国家的人民’及其要捍卫的边界，后者让我们理解了何为‘国家的光辉’及其要尊崇的中央”（白晗、汤芸，2015）。

更为重要的是，王权共同体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个集合体并不需要清晰的民族边界，它也可以是一个围绕中心建立起来的、自由延伸的集体。如果民族成为边界封闭的集合体，就会变得极其矛盾和危险。而王权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不仅尊崇中心，而且边界模糊。安德森在研究欧洲王室时就指出，王室的成员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王朝的臣民也“极度多样而异质”（安德森，2011：18）。实际上，神圣王权的权威和扩张来源于中心对四周开放性地影响和吸纳，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不断扩大神圣中心影响的前提。一次新的联姻或朝贡关系的确立，往往是王朝对一种外来异质文化的吸纳包容，不仅不影响王的权威，反而加强其统治的力度和声望的辉度。共同体是需要吐故纳新的，它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接受陌生群体的冲击和挑战，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出混沌、重建秩序、获得生命力。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指出，内米湖畔的森林之王的宿命，就是被下一个折下“维吉尔的金枝”的逃奴杀死，然后被取而代之。这样的安排，揭示了王的威力和活力必须依靠外来的新鲜肉体来传承，由此保证整个古罗马王国的丰产和福祉（弗雷泽，2013）。萨林斯在“陌生人之王，或者说，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文里则更加直白地指出，必须通过整合外部存在和权力，社会才能获得自身的认同和秩序。他也看似谦逊地说，这其实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萨林斯，2009）。民族主义的危机，往往就是封闭性的危机。一个封闭的共同体，永远无法与另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共生共存，带来的就往往是冲突和战争，而一个拥有生命力、和平包容的共同体断然不应该如民族-国家一般，如此保守排外。

三、超越民族主义的路径探索

历史上,封闭的民族其实并不存在,民族间的交流是常态,且多民族共生共存也是客观事实、大势所趋。虽然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或许存在“想象的边界”,但在实际生活中,所谓的民族边界是极其模糊的。婚姻、贸易、移民和现代科技不断地促进民族的交流,从而瓦解民族“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迷思。可以说,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自在的、非历史的、固化的实体。实际上,组织形塑民族-国家的方式,并不需要简单粗暴地分割和关闭边界;集合族群的往往是向心的凝聚力。所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关键,就是要承认,凝聚一个族群的中心性传统本身就是杂糅多元的。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述中,安德森其实已经明确指出,民族主义的传统一直是多面向的。如创造官方民族主义国家传统的,从来都是那些由通婚、征战和兼并带来的操不同语言、享不同风俗的族群。而一个新兴民族-国家所谓的民族传统,从一开始也就被印上了宗主国、临国和移民文化的烙印,如越南民族主义的兴起离不开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印度的民族主义中也无法抹去英国殖民的影响。范可在谈到各国超越民族主义的尝试时,也指出了为超越民族主义桎梏,各民族-国家建构新的中心性象征的各种努力,而这些新的象征中心都是多元的。在法国的先贤祠中,黑白混血的大仲马和意大利裔的左拉赫然在列,祖籍波兰的居里夫人也位居其中。因此,建立“超越族群与宗教边界的法兰西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就是承认法兰西文化传统本身的多民族性和多文化性(范可,2015)。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等学科对“华夏民族”的研究,也反复验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合性。聚焦中国西南地区,正如张原指出的一样,各民族在藏彝走廊中“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状态,在丝绸之路、茶马古道间的“分而未裂、融而不合”,更是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最佳注解(张原,2014)。

认识到族群传统的“杂糅多元”,才能够从根本上消解民族主义封闭边界带来的紧张感和极端、民粹主义倾向。一种“杂糅多元”的民族观才能正确认识到“民族”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主动的包容性。中国西南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民族间的交流竞争才是每个民族生命活力的源泉。此外,人类学者们在泰国南部的研究也指明了当地的文化遗产实为泰国佛教徒和马来穆斯林共生共存的产物,历史上还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移民文化的影响(Horstmann,2011)。理解多元的族群传承,才能在民族-国家内部正视所谓的“次族群”(subaltern groups)的文化分量和政治影响,进而在民族-国家之间打下交流交通的基础。在官方的民族-国家形象建构里出现的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的身影,这可能只是开始。“次族群”的文化传统如何进入到官方民族-国家的话语和生活的权力运作中,如何在融合中消解民族间人为划分的边界,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警惕在理解多元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掉入民族主义的窠臼,把“次族群”的文化遗产单一化、固定化。

再者,超越民族主义的束缚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安德森曾略带嘲讽地谈到,把民族坐实的,往往是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比如,有意无意的,他们的历史学的意识(historiographical consciousness)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所左右,写成的“民族史”也是一些张冠李戴的牵强附会。他风趣地说道,“那些强迫约翰王接受大宪章的男爵们根本不说‘英语’,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自己是‘英国人’的概念,可是他们还是在700年后的联合王国的课堂内被扎扎实实地界定为早期的爱国者”(安德森,2011:114)。再比如,专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编撰方言话、词典、文法的学者和语言学家,对语言民族主义的构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以现代希腊文“去野蛮化”的过程为例,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纷纷把现代希腊文“修正”成符合“闪亮的、充分异教徒式的、古代的希腊文明”的语言,从而塑造各自民族的历史性(安德森,2011:70)。安德森反复地强调,语言根本上是具有包容性的,“发明民族主义的是印刷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个特点的语言本身”(安德森,2011:126)。民族的印刷语言的确立离不开专业的知识分子,民族的属性与政治意识的紧密结合也离不开精英知识分子的推手。因此,消解民族的封闭性和紧张感,亟待需要打破民族主义的知识观。

人类学的研究一直在对民族身份的本质化和政治性（politics）进行反思。把民族的问题转化为“民族化”的历史问题来研究，着重分析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博弈、文化冲突和情感纠葛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很多时候，人们还是在单一民族的框架下思考。必须要指出的是，民族作为一种“人造物”总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和形塑，民族必须要被放进一个互动交通的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网络来理解。正如张原指出的一样，中国西南民族区域研究的“真问题”，必须是关于各民族交互共生“关系”的考察（张原，2014）。推而广之，哪个族群、文化的研究离得开对“他者”的理解呢？把民族放进共生共存的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发现“想象”的根本机制，是“关系”的制造，是与“他者”爱恨交织的历史。

四、余论

安德森以极富创造力的思考，极具理想性的情感，极有说服力的语言，给予民族主义前所未有的感染力和战斗性。当今对民族主义的思考，绝对无法绕过安德森所指出的其背后文化和情感的力量，也绝对无法忽视安德森极具前瞻性的担忧。诚然，民族主义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蕴含的强大凝聚力和斗争性促使了一批批反帝反殖民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普通民众，特别是历史上被殖民被压迫的人民也在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找到了独立的身份归属。但是，这个概念带来的问题与它解决的矛盾一样多。在安德森的笔下，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身份；民族主义也不应成为战争冲突的借口。如果说《想象的共同体》成为了安德森眼中一个和野男人跑了的女儿，民族主义就像他们生下的没人管教的野孩子，搅乱着世界的和平。

解决当代的问题必须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灵感。本文对前民族-国家的王权社会的粗浅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指出以“典范中心”和“辉度”构建共同体的历史延续，以开放互动消解内部矛盾的历史经验。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打破民族主义文化源头上的单一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用一种“杂糅多元”的历史观来梳理民族主义的流弊。对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简单陈述，也是同理。更重要的是，中国西南区域内的民族交流交通还在延续，为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理论建构提供着生动有趣的材料和启发。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安德森生前的忠告：“时间在加速，以前需要几百年才能做到的事，现在有个十年就行了。真正信仰上帝的人越来越少。谁知道呢？民族主义的崛起本身就比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积累要迅速很多，使用起来很方便，但现在不一样了，基督教、神学像是一些老古董，民族归属，也许它不会太重要的一天也很快会到来”（安德森，2014）。不知道，这为刚逝去的大师级学者是否希望能早一点在天堂跟民族主义这个老朋友见面。

参考书目：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 【英】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
-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白晗、汤芸，2015，“制造‘太阳王’的光辉——从《制造路易十四》看神圣王权与民族国家的塑造”，《民族学刊》2015 年第 4 期。
- 【英】弗雷泽，《金枝》，汪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 【美】马歇尔·萨林斯，《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刘琪译，《中国人类学评论》2009 年第 9 期。
- 范可，2015，“‘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困境——兼及不同国家的应对策略”，《思想战线》2015 年第 3 期。

张原, 2014, “‘走廊’与‘通道’: 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民族学刊》2014年第4期。

Alexander Horstmann, 2011, “Living Togeth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 – Religious Coexiste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 (4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有一天民族会变得不重要”, (2014-04-16) (2015-05-7)

<http://history.sina.com.cn/cul/zl/2014-04-16/114888551.shtml>.

【网络文章】

从“帝国之眼”到疆界之辨¹

章永乐

“门罗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不理解“门罗主义”解释的演变以及其根本思维方式,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美国从一个新建的国家到区域霸权再到全球霸权的整个过程,难以深入把握我们所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一般读者熟悉的“门罗主义”,是聚焦于“西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但事实上,美国“越出”西半球,走向全球霸权,也离不开“门罗主义”的话语运用。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

第一问

新书《此疆尔界》考察了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这个对国际秩序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概念,并从全球史视角,梳理了“门罗主义”的话语谱系。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对“门罗主义”这个论题产生兴趣的?

章永乐:我的研究其实是先被当代问题激发,再回溯历史。特朗普上台以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执政精英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焦虑,担心其他国家在国际层面“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感谢小沈阳的格言句式给我的启发)。特朗普政府加强对拉美国家内政的干涉,并公开警告它们不要和中俄两国走太紧,公开赞扬“门罗主义”。但仅仅几年之前,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这就让我思考一个问题:美国在拉美地区对中俄的拒斥态度,究竟应该怎么放到美国的外交传统里来理解呢?在2018年初,我开始了对“门

¹ 三联学术通讯 <https://mp.weixin.qq.com/s/VHRXtYNgd-Z6Q02kdHDcPQ> (2021-6-22)。

罗主义”的研究，研究的盘子越来越大，到了2019年12月，就有了一份14万字的书稿，刘小枫老师组织了一个研讨会来讨论这份书稿，师友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2020年1月初，我去了法国南特高研院访学，在那里继续修改书稿。不久，全球爆发新冠疫情，法国在3月份进入封城状态。一切公共活动都停顿下来了。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物理边界都被激活，大家相互疑惧，保持“社交距离”；同时被强化的也有各种群体的身份认同的边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互“甩锅”、污名化、找“替罪羊”的现象，许多海外中国人非常担心自己成为种族歧视、种族迫害的对象。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还认为“世界是平的”了。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热衷于拉小圈子，建小群，把不信任的“群友”踢出去，这种“圈子化”已经影响到了供应链、技术标准、互联网秩序等方方面面，而这与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的空间观念多少具有某种共通性。这让我意识到，有必要从“空间政治”的高度来思考“门罗主义”及其全球传播，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过去的“此疆尔界”，也可以更积极地思考未来“此疆尔界”的形态。

当然会有人问：你一个中国人，怎么会一开始对美国与拉丁美洲区域的关系感兴趣呢？简单的回答就是，我在美国洛杉矶住过五六年，有一年就是住在拉丁裔社区里，周边到处是墨西哥与古巴移民，满耳朵听的是西班牙语；我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中饭吃最便宜的墨西哥卷饼（Burrito），吃了一年的理发店，给学生理发的也是一个墨西哥大妈；听比较政治学的课，也听了不少拉美的案例，以及以拉美区域研究为基础的理论。可以说，是早年这些生活经验让我克服了对拉美区域的陌生感，让我能够以它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进行一些理论思考。在我的第二本书《万国竞争》中，我也探讨了康有为在墨西哥开银行的经历，以及康有为对美国总统制移植到拉美产生种种军人独裁现象的论述。

第二问

“门罗主义”原本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历史命运？

章永乐：研究“门罗主义”的全球传播史和接受史，就是凝视美国的“帝国之眼”（我在后记里说，这是一本“凝视深渊”的书），同时思考这种目光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传染性”。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能够影响近代的德、日两国，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德、日两国有建构区域霸权的资本，它们的精英在与美国交往中，发现可以模仿“门罗主义”的区域霸权解释来拒斥美国在“越出西半球”之后对它们的干涉与抑制。但近代中国不仅失去了朝贡体系，自己也沦为半殖民地，根本没有建构区域霸权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门罗主义”话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中国呢？《此疆尔界》最后两章讨论了“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门罗主义”如何从“超国家”的空间层面“下行”，走到省域乃至省域以下，于是有了“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这样的口号，我称之为“省域门罗主义”，它在象征符号层面强化省域边界的政治意义，甚至赋予省域一种半神圣的法律人格，排斥外省势力乃至掌握中央政权的势力对省域事务的参与或管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近代美日两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多是具有“门罗主义”修辞或思维背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的近代精英人士也会在“超国家”层面对美国与日本的“门罗主义”作出自己的回应。

美国的“门罗主义”进入汉语世界的途径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此疆尔界》梳理了较早时候传教士和在华英文报纸对于门罗总统及其主张的介绍，这些介绍并没有引起中国士大夫的集中关注。1898年，美国打赢美西战争，并着手镇压菲律宾人的反抗，日本舆论界担心西方列强瓜分亚洲，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的结合，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磨大讲“黄白种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个舆论气候影响到了当时的旅日中国精英。梁启超领导的《清议报》团队在“门罗主义”的传播当中发挥了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欧榭甲，在观察菲律宾的抗美斗争过程中，仿照“门罗主义”的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概括出“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这个说法，进而在其《新广东》中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广东

为广东人之广东”两个反满口号。杨毓麟模仿《新广东》作《新湖南》，鼓吹“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旅日精英相互影响，形成了很多反满的地方主义论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最后接受了“五族共和”，反满主义衰落了，但地方主义却持续发展，“门罗主义”话语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政府和其他省份的政治势力的重要话语工具。美国在一战期间的在华宣传，让“门罗主义”以及威尔逊的新解释获得广泛传播，于是在后来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省域门罗主义”话语风起云涌。《此疆尔界》总结了二十多种“省域门罗主义”或类似于“省域门罗主义”的表述，比如说湖南有“湖南门罗主义”，广东有“广东门罗主义”，奉天有“奉天门罗主义”，云南有“云南门罗主义”。有些省份的本地精英即便不是直接主张本省的“门罗主义”，也往往提出“X人治X”的口号，要求由本省人担任军政和民政领导，驱逐外省籍长官，排斥中央政府的干涉，同时在军阀的混战之中，保持中立，保境安民。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国共两党都认为“联省自治”的道路已经走不通，通过革命重新统一全国才是正途。到了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地方实力派以“保境安民”为由闭关自守，不配合抗战大局，更进一步失去了正当性，“省域门罗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此疆尔界》最后一章梳理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对“超国家”层面的“门罗主义”的回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许多中国精英被美日两国的“门罗主义”所吸引，然后经历了一个逐渐祛魅的过程。我讨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康对日本观感的变化与日本政府面临清廷压力，拒绝给他支持有关；孙中山对日本观感的变化则与日本政府在袁世凯死后支持段祺瑞政府有关；梁启超对日本“门罗主义”的祛魅则基于他在数年内对于“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思考。我探讨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为了获取美援，区分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门罗主义”的话语策略，也讨论了国家主义思想流派“战国策派”对“门罗主义”与全球秩序未来的看法。全书最后讨论的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在东渡日本之前就已经开始批判日式“门罗主义”，此后一直不断对日式“门罗主义”加以揭露。他还是第一个把超国家的“门罗主义”和民国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放在一起，揭示其共同原理并加以批判的作者。在国际层面，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提出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大相径庭的“新亚细亚主义”，主张区域内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愿联合形成区域联盟，最后在区域联盟的基础之上，完成全世界的联邦化。李大钊的主张，是旗帜鲜明的反帝主张，同时也没有像梁启超或“战国策派”一样，想象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的复活。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话语资源。

第三问

为什么“门罗主义”可以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在“疫情”的时代背景下，“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

章永乐：刘小枫老师在封底推荐语中指出，“门罗主义”是当今国际政治思想领域的“头等问题”。我完全认同这个判断。不理解“门罗主义”解释的演变以及其根本思维方式，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美国从一个新建的国家到区域霸权再到全球霸权的整个过程，难以深入把握我们所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一般读者熟悉的“门罗主义”，是聚焦于“西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但事实上，美国“越出”西半球，走向全球霸权，也离不开“门罗主义”的话语运用。比如西奥多·罗斯福在解释美国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就说，如果说“门罗主义”旨在阻止欧洲列强在美洲获得新的领土，“门户开放”旨在阻止它们在中国获得新的领土。而威尔逊1917年对“门罗主义”的全新解释，更是去除了“西半球”的空间限制。

但是，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并没有改变“门罗主义”的根本思维方式。在区域霸权阶段，美国将拉丁美洲界定为一个奉行共和政治原则、保留了更为积极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区域，将欧洲列强视为腐败专制的力量，进而以排斥欧洲列强干涉的名义，来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在下一个阶段，美国在全球的范围内，界定全球空间的“同质性”，排斥其眼中那些“异质性”的因素。它在话语层面主张尊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选择自己道路和政治制度的权

利，但它实质上又会预设，如果被给予真正的选择权，每个国家和民族自然会选择接近于美国的道路与制度，如果没有这么做，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外部的干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干涉。这种“代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的姿态，就会造成以“不干涉”“反干涉”的名义进行干涉。这种话术形成习惯了，就会到处留痕。比如说，我们知道拜登最近见了普京，他想给俄罗斯上一课，于是就说俄罗斯受到了中国的“挤压”，这让我们忍俊不禁，但联系“门罗主义”话语传统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但美国的干涉又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往往跟美国资本的扩张需求关联在一起。资本是一种悄无声息跨越空间边界的力量，它诉诸主体的自由选择，推进那些阻碍资本扩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习俗的解体；而当它遭遇到当地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的时候，“干涉”的政治需要就出现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拉美的经营史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理解干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门罗主义”对美国当代的国际政策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呢？仍然可以从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来看。在区域层面，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在拉丁美洲大讲“门罗主义”，大肆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排斥中国、俄国与该区域国家的正常交往。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特朗普政府针对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话语，但在实践层面，很难逆转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既有拉美政策，在行动上更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正常交往的排斥。而如果从全球的层面来谈“门罗主义”，可以说特朗普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语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门罗主义”思维方式在全球空间中的适用。毕竟，公开地鼓吹自私自利（而非将自己的私利包装成为普遍利益），对盟友锱铢必较，不利于打造一种关于全球秩序的同质性话语。但我们也要看到，在2020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也开始打意识形态牌，试图联合一些盟友来围攻中国，“五眼联盟”中的一些国家应声而动。拜登政府摒弃了赤裸裸的“美国优先”话语，试图用一种“拉帮结派”式的“多边主义”，将西方阵营联合起来，将“国际社会”界定为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体系，将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因素加以排斥。

不过，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有一个共同点：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美国高速扩张阶段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二分，这种划分当年有助于掩护美国资本在别的国家和地区攻城略地。但今天的美国担心自身的经济霸权不再稳固，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利于美国资本的国际竞争了，于是取而代之的就是将**经济政治化**的策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纷纷被作了“有罪推定”，从“危害国家安全”、“债务陷阱”到“强迫劳动”、“环境污染”、“知识产权盗窃”，不一而足。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的时候，就说中国贸易不自由，是个异类；现在美国缺乏底气讲“自由贸易”了，就说中国贸易不公平，仍然是个“异类”。但是，美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一贯的，就是要垄断对于全球秩序规则的解释权，然后先声夺人，把其认定的对手描绘成为规则的破坏者，以防卫的名义来进行攻击。

第四问

这本书提到了很多历史上的“国际法”或“公约”，比如拉丁美洲的区域国际法，比如《巴黎非战公约》，等等。这些所谓的“国际法”“公约”与“门罗主义”有什么样的关联？其背后蕴含着怎样意识形态？

章永乐：“门罗主义”与国际法的关系是《此疆尔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大致可以说，在美国确立西半球霸权之前，美国执政精英比较倾向于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在1895年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中，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宣称美国与美洲各国“地理相近”，具有“自然的同情心”和“同类性质的政府”，因而结成联盟，根据“门罗主义”原则对所有西半球国家提供保护。美国在这时候说“门罗主义”是美洲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从美洲空间排斥欧洲列强。在美国通过处理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确立起西半球霸权之后，美国政府的立场迅速发生转变，对“门罗主义”的定位从“国际

法原则”转向“外交政策”。1923年，哈定政府的国务卿、国际法学家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撰文明确指出：“门罗主义体现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保留了定义、解释和实施的权力。”

美国执政精英这个转向背后，隐藏着非常冷静的利益计算。在确认欧洲列强已经难以实质干涉西半球事务后，再继续宣传“门罗主义”是一个国际法原则，就会束缚美国自己打造区域霸权的手脚，因为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去争夺它的解释权。在对“门罗主义”的阐释上，尤其涉及到主权平等与不干涉问题，美国的法学家与一些拉美法学家始终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前者仅主张一种形式上的主权平等，并反对后者的绝对不干涉主张，从而为美国干涉美洲各国内政保留法律上的空间。国际法学家出身的休斯对“门罗主义”的性质界定，背后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斗争的背景。

在越来越多介入全球事务的背景下，美国会尽可能避免让签订的条约束缚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行动自由。比如说美国政府对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签订的两项《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都作了保留，称“上述公约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可被解释为暗示着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了其对纯粹美洲问题的传统态度。”在1899年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鼓吹“海权论”的马汉作为美方代表，强烈主张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管辖权不应及于那些“纯粹美洲”（Purely American）的问题。1919年各国在巴黎制定《国际联盟盟约》时候，威尔逊总统往里面塞了第二十一条，规定“国际协议如仲裁或区域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实际上就排除了国联对许多美洲事务的管辖。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 Kellogg）推动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又称《巴黎非战公约》）的签署，公约第1条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拒斥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1928年7月14日法国对于美国致各原始签字国的同文照会发出的复照中主张：“新条约并未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妨害自卫的权利。在这方面，每一国家均将永远保有其领土不受攻击或侵犯的自由；只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决定情况是否必需诉诸自卫战争。”而美国将维持“门罗主义”作为其“自卫权”的内容，英国也提出了要维护自己遍布全球的帝国领地，这通常被称为“英国门罗主义”。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经常基于“门罗主义”对国际条约提出保留，而在美国比较强势的情况下，甚至能够直接将“门罗主义”的实质内容写入一些国际条约的正式条款之中。美国认为只有它自己才能解释“门罗主义”，其他国家无权置喙，这是一个在国际事务上做“决断者”（decider）的姿态。什么叫“决断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我们说了算，并不是因为我们一贯正确；我们一贯正确，是因为我们说了算”（“We are not final because we are infallible, but we are infallible only because we are final”）。这就是“决断者”的姿态。在美国确立全球霸权之后，它给自己保留的“决断”事项就更多了。如果我们要找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表现，美国基于“门罗主义”展开的条约实践，就是非常生动的例子。

第五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锐老师在书评《门罗主义变形记》中将你的三本专著《旧邦新造》《万国竞争》《此疆尔界》称为“重估近代秩序的三部曲”。这三本书似乎有一个一贯的关照，就是通过思考近代中国来思考当下的中国，甚至是未来中国的道路。那么激发您写作这本书的当代问题是什么？对于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国际处境，有什么样的展望？

章永乐：我关心的还是我们当下面临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确立的单极霸权，已经不再是不言自明了。美国的科技霸权在某些领域已经动摇，金融霸权因美联储滥发货币而日益不得人心，但其军事霸权仍然相当强大，意识形态仍对西方盟友具有一定感召力，但已经没有力量将G7转化为反华同盟。历史上美国受到德国、日本、苏联的挑战，所以它也会用它的历史经验来理解中国复兴带来的冲击。而德国与日本当年

在挑战美国时，模仿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美国一些精英将中国的南海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称为中国的“门罗主义”，反映的正是担心中国“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的心态。

《此疆尔界》要揭示和回应的正是这种“以己度人”的心态。美国“门罗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划出一个连续的空间、界定内部的同质性、然后排斥异质性的因素，但“一带一路”并不是这样的思路。“带”和“路”指向的不是有确定边界的封闭空间，而是连接不同空间的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也不遵循“英国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布全球，“英国门罗主义”并不是划定一个连续的空间并界定其内部的同质性，其重点在于以全人类利益的名义论证英国对于一系列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的合理性。但是，英国当年控制的交通枢纽，哪一个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中呢？“一带一路”首先是承认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进而通过“路、带、廊、桥”，在多元文明之间达成“互联互通”，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倡议中包含了经济金融层面的积极合作，但并非是用从经济社会关系中“脱嵌”（disembedded）的资本力量，来“夷平”充满重叠性、多样性、流动性的区域秩序。中国有不少“走出去”的企业，但没有哪个能像美国当年的“联合果品公司”那样呼风唤雨的。美国炒作“债务陷阱”等议题，恰恰是用它当年在“门罗主义”之下推行的“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经验来描绘中国的实践。

当年的德、日精英以美国“门罗主义”为榜样，划定区域霸权的势力范围，并尝试用一套以区域“大空间”而非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将区域霸权格局固定下来。中国主张的“多极化”路径与此大相径庭。中国一方面坚持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的姿势么？美国在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基础之上建国，到今天也不过是3亿多人口，从全世界汲取资源、财富和人才，向全世界转嫁发展成本，但仍然难以克服其内部巨大的社会分化与对立，14亿人口的中国走得了这样的道路么？真的愿意走这样的道路么？20世纪以来，中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不对外侵略和殖民，依靠本国人民自立更生和自主性对外开放，耗费尽可能少的资源，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现代化的道路。走通这样的道路，才有可能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时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感召力和辐射力。

但是，许多美国精英既然认定中国要“走美国的路，让美国无路可走”，中国作为被攻击的一方，光靠辩白也改变不了什么。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推进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试图修改国际规则，尽可能让中国发展得慢一些。而我关注的是在这一背景下空间秩序的新的变化，比如说，许多区域和国家都在寻求建立更可靠安全的供应链，一些新的“准入门槛”正在出现；数字基础设施（如5G网络）用哪个国家的科技，适用谁的技术标准，变得非常敏感；互联网秩序中在进行着“数据帝国”与“网络主权”的斗争；金融秩序中正在进行着美元霸权与“去美元化”的斗争。这些标准和管辖权之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与更为抽象的空间观念关联在一起。由于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相似位置，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的斗争时，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同时，也能够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互通声气，共同保护发展权。

第六问

完成了这三部曲之后，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写作计划是什么呢？

章永乐：在写作《此疆尔界》之前，我正在尝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内外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二十世纪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内宪制的关系。之前提交给法国南特高研院的也是这个研究计划。“门罗主义”是个意外出现的研究议题，结果在一段时间里反而变成了我的主业。写完《此疆尔界》之后，我正在回到原来的这个研究计划，最近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在欧洲的影响之下出现的“二十世纪之宪法”的观念。我的近期计划是写一本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秩序的剧变给中国的国内宪

制和相应的秩序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我的中国宪法史研究过去比较多聚焦于晚清与北洋时期，以后会慢慢地往后面走，进入到对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讨。

此外，我也在写作一本关于“帝国理由”的书，梳理近代以来的殖民帝国的精英们为帝国扩张和统治进行辩护的各种理由。我在北大开了一门本科生课程来探讨这个主题，已经讲过三次，每次都比上一次增加一些内容。我想以讲课为契机，把这本书写出来。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遭遇了许多污名化攻击，有一些话语实际上是从近代殖民帝国的话语中衍生出来的。我想，如果有更多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殖民帝国的继承者们作出回应，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和许多曾经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发展中国家找到更多的共同话语，共同捍卫发展权。

第七问

《此疆尔界》每章开头都有一首诗，与内容暗暗呼应；全书开篇还引用了海子的《亚洲铜》。我们也知道您特别喜欢诗歌，有一个笔名叫“海裔”，最后能否请您分享一位自己最爱的诗人和一首自己的小诗。

章永乐：我大概是从初中开始涉足现代诗阅读和写作的。读得比较多的，有荷尔德林、里尔克、叶芝、顾城、海子、欧阳江河，等等。但谈得上多少有点研究心得的，可能还是海子的诗。海子是北大法学院 1979 级本科生，是我的学长；我还认识好些当年和海子有交往的前辈老师，比如张旭东老师、苏力老师——苏力老师 1980 年就在《诗刊》第 6 期发表诗歌《云海上》，而海子第一次在《诗刊》发表诗歌是 1988 年。在我看来，海子是一个北方化了的南方人，一个被中国的游牧文明和内陆边疆深深吸引的农民子弟；海子的诗歌是对中国地理空间的精神书写，他歌唱了中国的丘陵、平原、河流、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绿洲、高原湖泊，歌唱了在中国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阳、月亮和星辰。他对“建筑祖国的语言”（语出《祖国，或以梦为马》）的执着，感召着后人。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从事的何尝不是“建筑祖国的语言”的工作呢？只不过这里的语言首先是历史叙事的语言、理论的语言。

2019 年 9 月 13 日（中秋节）于北京

【网络文章】

王赓武谈他的家与国

上海书评 <https://mp.weixin.qq.com/s/pZskZTIXodcmlTF1M0r7Yw>（2021-6-20）

王赓武，1930 年生，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广泛涉猎东南亚史、海洋史、中国近现代史、海外华人史等领域的研究，有多部重要著作问世。历任新加坡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自港大荣休后长居新加坡，对东南亚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及东亚研究所等机构有推进之功。2020 年，王赓武获颁第四届“唐奖·汉学奖”，及新加坡“特功勋章”。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部回忆录——《家园何处是》与《心安即是家》。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毛升博士最近代表《上海书评》采访了王赓武教授。

您生在印尼泗水，在马来西亚怡保长大。但父母从小就对您说，您是中国人，随时准备回到中国。这种教育曾经困扰过您吗？

王赓武：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父母的回国计划，也把为我回国生活做的准备看成自然而然。1936 年，我们回到中国（当时还是中华民国）待了几个星期，又走了。我听说，我的祖父母要

求我们离开中国，因为抗日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我爷爷无业，而我父亲那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的话，他可以从国外资助我爷爷。第二年，当战争爆发后，我父亲的收入确实成了他在中国的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我因此认为，我们会在怡保待到战争结束，然后回国。在此期间，我继续在家学中文，在学校学英语。大部分的邻居都把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我因此交了很多好朋友。父母对我这个独子很在意，关怀倍至。

一直到十一岁，我的童年都是既安全又幸福。但是，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三年半时间里，这种状况改变了。在充满变数的那几年里，父母从没提过要回中国，我也没有继续上学。我们搬了好几次家，住过镇上好几个地方。我从几次搬家中学到很多，看到了很多在工作或嬉戏的不同的中国人。那时，我所有的教育都来自我的父亲，他在家教我古文。在日据时代，我父亲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靠着不稳定的工作，养活母亲和我。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并用了几乎两年的时间回国做准备。我也很期待那个回国的时刻。我知道我们之所以推迟回国，是因为父母希望我能在当地拿到高中毕业证书，那么不用在中国上高中，也可以参加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这个计划实现了。我父亲能想得那么周到，真是我的幸运。他让我明白，寻找一切学习的机会，继续学习，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认同的那个中国，是什么样的？

王赓武：父母时常向我解释，中国正在抵抗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敌人，并竭尽所能在保卫这个国家。父亲从来不谈政治。他专心地教我古文，并通过古文让我明白，中国古代文明有多么伟大。我的母亲告诉我中国老家的情况，说得最多的是王家。她告诉我家里都有哪些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她说起老家的那些人总是说得活灵活现，因为她知道大多数家人的奇闻逸事。因此，我对这些家属成员可谓耳熟能详。我的父母在以各自的方式，让中国变得对我来说，既真实，又有关联。后来，**我意识到，该让我知道关于中国的什么情况，他们都经过了精心挑选。**我父亲特别注意如何使他们在家里教给我的，和他们希望我从学校里学的东西之间，能保持平衡。他敏锐地意识到，他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是偏颇的，学习方法也很枯燥。他因此决定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将学习变得愉快，从而效果也更好。我当时并不理解，后来才意识到并非非常感激，他不仅教给我中国对他意味着什么，并努力为我适应现代社会做准备。

您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再调整国族认同，开始认同马来亚是您的国家，最后又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您怎么理解“国族认同”？

王赓武：我曾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讲中国话，过中国人的生活，但我从来没有被教育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家说国语，父母的朋友和同事主要来自江苏和浙江，他们也说国语。但是，怡保镇上的大部分中国人说粤语、客家话，以及福建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等多种方言。在抗战时期，我在镇上学会了讲粤语和客家话，因此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别扭。我意识到，马来亚的中国人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日本人对此很警惕，将其看成是一种威胁。

父亲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说话从来不用民族主义的词汇。他在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很喜欢，并认为这是理解后五四时代的中国人热切希望去了解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好方法。他认为，中文由他来教我，我在回国前及早学会英文，因此他送我进入一所英文小学。最初教我的两个老师都是英国女教师。之后，教过我的老师来自不同的国家，如马来亚、印度和斯里兰卡。我的同学都是来自不同社群的男孩子，在学校里，我们都要说英文。我们从来不谈民族主义。我是在为中国抗日战争筹款的集会上才开始接触到民族主义的。

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才是正常的，也总是试图避开任何的族群政治意识（political communalism）。这种背景意味着，我并不是在一种强烈的国族认同下长大的。我为自己生为中国人，并了解中国而感到骄傲。即使在学着做一个马来亚的公民后，仍然保持着这种自豪感。马来亚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新国家，其中包括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锡兰人和欧亚（Eurasians）人，他们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定居。人们讲各种各样的语言，信仰很

多不同的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习俗。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很有意思，相信我在这个多元社会中的各种经历不仅健康，而且正面。在一个鼓励这种多元性的大学里，我研究中国古代史看起来是正常的。当因为政治原因我不能研究近现代中国史了，我就转到了能够研究该历史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我从来不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原因而研究中国，但是因为我的中国背景，我热切地希望能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中国。

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像我这样的学者也可以访问中国了，我希望能去中国做研究。我的澳大利亚同事和学生被政府允许去中国，但马来西亚政府却拒绝了我的请求。遭到拒绝后，我觉得别无选择，只好变成澳大利亚公民，继续我的学术研究。几年后，我成为香港大学校长，我以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访问了中国。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我担任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因为那里没有国籍的要求，我在新加坡生活了二十四年。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中国认同从来没有成为问题。我在学术界的朋友，包括中国人，都从来没有质疑过我的中国认同，我对此很感激。

您在书中详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国的复杂过程及造成的冲突，说明建立新国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这种复杂性是否说明“民族国家”并不必然比“帝国”更容易治理？

王赓武：对欧洲之外的地方来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新的概念。即使在欧洲，只有到了十八世纪，它才被普遍接受。在亚洲和非洲，民族国家是作为二十世纪反殖民运动的一部分才开始进入人们的想象的。只有在二战结束后，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帝国被迫解殖，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才成为可能。东南亚和非洲的这些民族国家都是新成立的，它们的大部分边界，都是帝国主义者划定的。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边境之内的人数较少的族群被当成是一个个“民族”，要么强行同化，要么必须服从多数民族的要求。这成为大多数少数族裔纠缠不清的痛苦经历。有些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难以治理，甚至沦为没完没了的民族冲突的战场。

我不知道帝国是否比民族国家更容易治理。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尽管帝国要求子民服从，但通常允许他们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只要求在有限的方面跟主人一致。皇帝通常也只在乎自己的荣耀和仪式而已；他们为自己的子民做得很少，也只有当老百姓出现有组织的叛乱时才会镇压。相反，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公民严格地遵守清晰定义的民族规范。因此，它们的政策和做法通常造成民众的不满与不信任。当人民产生了这种情绪时，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治理。

您经历了马来亚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即新国家的建立。现在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最起码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是“现实论”（realist idea），另一种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代表的那种“建构论”（constructivist idea）。您支持哪种观点？

王赓武：我佩服安德森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洞见。该观点无疑启发我重新思考关于“民族”（nationhood）的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预设。但我必须要承认，作为一个研究“民族”形成史的历史学家，我认识到，很多民族的形成不只是因为“想象”，更常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有时候是由同一个王室统治）长达几个世纪。在那些情况下，很难说现实的因素不是比想象的作用更大。我也发现，现实论与建构论并不互相排斥。基于现实论而建立的民族如果加上想象的牵引，可以变得更加牢固与自足。但是我也相信，只有出现了有利（favorable）的情况，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民族。我这么说，听起来似乎对这两种观点都同样地支持。然而，我身上的历史学家特质，让我更倾向于支持现实主义，只有在该土壤上，想象才可以扎根。

您提到“东南亚”是一个新建构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东南亚有什么重要性？

王赓武：因为将这个区域称为“东南亚”是一个新的理念（与那些模糊的地名，如南洋、马来西亚、印度支那、素万那普乡比较而言），就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东南亚最初是指代欧洲帝国解体后，英国所承认的那个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区域。作为一个帝国主义争夺利益的战略下的衍生品，“东南亚”在几个层面上给了人们以新的思路。在冷战时期，该概念被用来探索使该

区域自外于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如模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一个扩大化的东南亚公约组织）。最终，在印共瓦解后，该区域成立了具反共倾向的东盟五国（小东盟）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东盟十国（大东盟）。今天，该区域因为处于两大洋之间，甚至加入了两个大洋所构造的一个高速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区，因此该地区给了这十国在全球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

中国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通常将他们作为中国人来研究。您同意这种研究路径吗？对于像您这样的人，应该用什么术语称呼更合适？

王赓武：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海外中国人的称谓不断在变。在中文里，中国人最早被称为“闽粤（商）人”。该称呼曾经很常用，直到十九世纪末被“华侨”这一称谓所代替。积贫积弱的晚清帝国声称，海外的中国人应该被看成是中国人，只是暂居在海外，他们对中国实行的新政有用，因此有了华侨这一称谓。这一称谓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动员华侨推翻满族的统治而开始流行，华侨甚至被有些人看成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期间，华侨为了祖国的事业捐助了大量资金，因此直到1950年代，还有人在用“爱国华侨”这一词汇。随着新建立的国家要求有中国渊源的新公民忠诚于新的国家，大部分华侨都同意，用“华人”来称呼这些定居的华裔人士更加合适，于是他们就被简称为泰华、菲华、马华、印华和缅华。

对于在侨办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办公室里使用任何称呼来叫那些海外的华人。但当他们公开出版供大众阅读的材料时，将海外华人看成与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一样，忽略这些人已经是外籍人士这一事实，对这些已经归化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是不利的。如果他们仍然被看成只是暂居在海外，可能在为中国工作，他们就无法被自己的国家信任，因此也就对促进他们的居住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无任何裨益。当然，有人认为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作用并不在意，怎么做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已。

然而，学者需要区分已经入籍的海外华人与仍是中国公民的华侨，并识别那些希望移民并在海外生活的新移民。我个人不用“散居者”一词，这是“diaspora”的直译。该词用来称呼过去2000年犹太人的状况才是准确的。这个称谓被普遍地用来称呼那些在国外生活的人们，但我认为应引起注意的是，精通自己语言的英文学界的学者，并没有用该称谓来称呼那些在海外的英语国家的人士。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拉丁美洲、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尽管殖民者已经离开了，但殖民的遗产还与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在心态上仍没有“去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殖民的历史？

王赓武：拉丁美洲、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四个地方的情形彼此很不一样。将它们表述为“殖民地”也是一种误导。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确实实行了殖民。它们建立了海外殖民地，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国家。别的殖民者，如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南非、罗德西亚和肯尼亚不同，因为殖民者在那里没有成功）的英国人也成功地定居了下来，建立了新的国家。但他们从来没有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真正建立起英国人的殖民地，而是利用中国人和其他族群的人来治理这两个港口。至于台湾地区，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例外，尤其对明清和中华民国历史来说，但我愿意做更多的比较。

可能有一种可称为“殖民心态”的近期的政治现象存在。我能理解这种心态可以解释那极少数举着英国国旗的香港年轻人。但我不认为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的独立运动跟这种心态有关。那里的反殖运动是为了将新加坡与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组合成一个国家，那时是冷战的中期，而大部分华人被怀疑是共产党。但是那个马来西亚失败了，因为新加坡不愿意接受自己只是十二个州中的一个，而华人将被当成二等公民。一旦分离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处于疑虑重重的马来西亚和敌对的印度尼西亚之间（这两个国家都比这个岛国大），新加坡从英联邦（包括印度、斯里兰卡和几个非洲国家）、欧洲和美国寻求帮助，甚至请以色列派专家来帮助训练新加坡军队。

这是一种投机的立场，而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成为了国家的生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您试图破解西方人加诸在华人身上的标签或刻板印象 (stereotype)，您认为如何概括华人的特点才是公平的？

王赓武：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最大的刻板印象，就是中国人都一模一样。我相信我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另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想赚钱，也知道如何做生意。这一看法可能符合早期的海外中国人的特征，他们下南洋是去做生意的。但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南洋当华工；他们努力谋生，一直到 1930 年代，主要的移民都是华工。二十世纪初期，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离开家乡，来到南洋经营报纸、担任公司和银行的职员，以及学校老师。

我必须补充一句，一些中国的作者和官员也倾向于认为，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希望所有海外华人都一样，希望他们能同样地依赖中国，这可能也是出于某种善意。这一认知符合很多刚出国的中国人的状况。但是对于那些在海外已经生活了几代人的华人来说，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情况，这些情况差异很大，远非一致。当然，很多人仍然认为他们是中国人，为自己被当成中国人而自豪。这一现象可能使得有些人产生一种感觉，似乎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一样。

对于华人移民，您觉得他们在居住国应该抱持什么心态？如何处理与母国的关系？

王赓武：大部分外国移民一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居住国能将他们自己看成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在此前提下，他们希望能帮助本国人和中国商人、甚至中国官员之间，以及以可能的方式为中国和他们各自的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有些人有能力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家了解中国，有些人在帮助中国了解他们自己的居住国方面特别有能耐。但是，如果他们被看成只是在做中国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对居住国的国家利益无动于衷，那就完全否定了他们在促进中国和他们各自的居住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上的潜在作用。

您曾说过，从小时候起，您就没有摆脱过革命的阴影。您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革命会成功，另一些革命却失败了？您现在的答案是什么？

王赓武：我一直以隔岸观火的方式在观察革命，也曾在南京短暂地观察过 1949 年之前中国的形势。那时我根本不懂为什么一些革命成功了，有些却功亏一篑。我个人得以亲身经历革命是我从中华民国回到马来亚之后。在那里，我经历过爆炸和逮捕，马来亚共产党如何在一次埋伏中击毙了英国总督，以及英国人如何把一些擅自占地的华人围在几百个类似集中营的“新村庄”。马共最终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得到马来人足够的支持。马来人是住在郊区和农村的马来亚的主要人口。而且马共也无法保住他们的安全基地，从而无法对政府持续地施加压力。印尼共产党也失败了，但原因不同。他们选择了走大众选举的道路，却严重地误判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们的领导人认为，在公开的政治选举中，他们可以击败军方。他们过度自信，最后他们的党以及革命之梦被彻底粉碎了。

中国对您意味着什么？哪里是您的“家乡”？

王赓武：那个叫做“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先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作为外籍华人，那是我的家乡。特别是江苏的泰州，早期的河北的正定，最后是山西的太原。该谱系最起码可以追溯至明清，然后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创造的语言，使得我可以连接我的家庭的过去及其文化根基。研究中国的历史，使得中国这一理念对我来说有着永远的意义。

我的家跟着我的父母，从印尼的泗水搬到马来亚的怡保。不算我住在南京的大学宿舍、还有新加坡和伦敦的那几年，我和妻子、孩子的家从英国搬到马来西亚，再搬到澳大利亚，还有我和妻子在香港和新加坡建立的家。

我研究终身的那个中国，从秦汉前后直至清代，曾经是皇帝-天下制度。接着是中华民国，而我曾经是该国的公民，直到十九岁为止。我 1973 年才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迷人的国家，我此后曾多次访问。这仍然是我的祖先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依然是我的家乡。

您和林婷婷女士之间相濡以沫的夫妻感情，让人动容。究竟什么是你们夫妻相处的成功之道？

王赓武：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成功之道。婷婷和我都发现，我们彼此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从文学和音乐开始。我们对对方在做的事情都很感兴趣，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她支持我成为一名学者，而不是一名公务员。除此之外，我们两家在马来亚都是新移民；她生在上海，我生在泗水。我们谁也不属于福建人、潮州人、粤人或客家人这些较大的群体。我们可谓是主流华侨群体之外的边缘人。

婷婷的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接受的是中文的教育，跟我父母也相处得很融洽。婷婷决定支持我的事业。我们移民到堪培拉后，她为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全职妻子和母亲，以及一位称职的儿媳。我们脾气迥异。她很灵敏、但容易失去耐心，也有点追求完美主义；我比较慢，有时则容易冲动，考虑问题不周到，做事经常有点拖拉。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学会了如何克服差异，培养爱情，彼此互相尊重。

我们还能有幸读到您的回忆录的第三部吗？

王赓武：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还要写我自己的人生。即使我有这个写作的意愿，我也不知道该谈点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是，如果我接着写，不会再写我的家了。婷婷给了我一个家，但那个故事已经圆满终结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38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